

### 第三章 台南市關帝信仰的發展

關羽從一介武將到受晉封為神祇，是經過歷代的推波助瀾與發展而來。在大陸地區，關羽信仰之繁榮與興盛，僅北京一地因屬明清國都，所有大大小小的關帝廟即有一百多間，若再算上周圍郊區則約有兩百多間關廟。從國都所在的區域關帝廟即有如此的規模，可見關帝信仰之普及，且就中國大陸寺廟總數目而論更是諸神信仰中廟宇數最多的。<sup>1</sup>台灣地區，民間供奉關公更是普遍，規模不一的關帝廟到處林立，各行各業、各種民間的組織，以及一般家庭供奉關公的神像亦隨處可見，顯示台灣民間對關公的奉祀也相當盛行。<sup>2</sup>

論及台灣民間對關公的崇奉，關帝廟的建置與發展不失為一個重要的指標。從移民進入台灣帶來關帝香火起，到世俗政權出於教化考量大加提倡關帝崇拜，由南部到北部，甚至東部地區關帝廟陸續被建立，且隨時代發展與日俱增。鄭氏時期、清代、日治階段到戰後，台灣地區的關帝廟數目有愈來愈多的趨勢。

在大陸，關帝經過官方不斷加封提高神格後，又被一般民間人士廣為信奉，早已成為全國最重要的神祇。台灣地區的關帝信仰發展，也循著同樣的腳步，因著官方的重視而奠定基礎，且隨著漢人拓墾的腳步一步步在台灣紮根。雖然甲午戰後，台灣統治權轉移，因政治力的介入使得發展有些遲緩，但在戰後宗教信仰自由的恢復後，又有另一番新局面。

台灣地區之奉祀關聖帝君，始於鄭氏入臺時期。今台南市的祀典武廟，即鄭氏之所建也，繼而各地皆有關公之廟祀。<sup>3</sup>台南地區是台灣最早開發的地區，關帝信仰亦領先他地發展。本章主要是以台南市為探討範疇，希望能以單一區域性的研究來窺見整體關帝信仰在台灣發展的概況與特徵。

---

<sup>1</sup> 馬書田，《中國道教諸神》（台北：國家出版社，2001年），頁306。

<sup>2</sup> 施哲雄，〈從台北的行天宮看關公在台灣民間社會的影響〉（盧曉衡主編《關羽、關公和關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148。

<sup>3</sup> 張炳楠監修、李汝和主修，《台灣省通志》卷二人民志禮俗篇（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年），頁14。

## 第一節 台灣地區的關帝信仰

在台灣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民俗宗教所扮演的角色對移墾社會的穩定與建立有相當重要的貢獻，所以一般學者的研究中，有關台灣民俗宗教的發展其研究內涵是相當豐富的。據前人研究的結果來看，台灣的民俗宗教的發展大略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自明末鄭成功勢力入台起，歷經清領時期漢人移民大量遷入，至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清廷割臺止。此一階段是台灣民俗宗教的萌芽期。大陸地區의 各種宗教信仰隨閩、粵兩省移民移植至台灣來，當時這些宗教信仰的內涵、祭典儀式及寺廟組織等，都與閩、粵祖籍地大同小異。藉由分香、分靈及進香等宗教儀式的聯絡溝通，閩、粵二地的宗教信仰與台灣的民俗宗教一直保持著一種類似親子的從屬關係。<sup>4</sup>第二階段是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民國三十四年（1945）的日本戰敗投降。這一階段的特色是日人透過政治力，展現對宗教的強力干涉。此種干涉產生了兩種效果：一方面切斷了台灣民間與閩、粵聯結的臍帶，從此台灣的民俗宗教開始自立發展成其特有體系；再則因日人「抑道揚佛」的政策，使台灣的民間宗教中注入更多佛教的成分，重新鑄造出一個本土獨特的宗教傳統。第三個階段是戰後中華民國政府遷台迄今約五十年的時期。這個階段的特色是激烈的社會文化變遷。首先是日人勢力的撤出，使得壓抑多年的宗教活動獲得紓解，各種宗教信仰更蓬勃發展。其後又隨著經濟水準的提高，交通條件的改善，使得民間的進香活動日益蓬勃，各式的祭典與宗教儀式在較佳的經濟力量的支持下也愈見盛大與參與熱烈。再其次因社會文化條件的變化，也導致若干寺廟祀神的地位發生了變化，如王爺、有應公及各種祖籍神明的地位相對下跌，而關聖帝君及玄天上帝的重要性則相對升高。<sup>5</sup>原本脫胎自閩、粵宗教傳統的民俗宗教，歷經數十年與發源地的隔絕，以及面對台灣地區特有的社會文化條件之變遷，已經逐漸的本土化。期間雖然遭逢外來宗教傳入及其強有力的宗教組

<sup>4</sup> 瞿海源編纂，《重修台灣省通志 卷三 住民志宗教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頁1083~1084。

<sup>5</sup> 余光弘，〈台灣地區民間宗教的發展—寺廟調查資料之分析〉（《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53期，1982），頁90~92。

織、佈道活動的威脅，但畢竟民俗宗教在台灣數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已與民眾的日常生活，及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產生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未來台灣民俗宗教的發展仍有相當的潛力。

在民俗宗教中，關帝信仰正是其中的一部分，而關帝廟在台灣各地也比比皆是。由廟宇分布之廣，可以看出台灣人對關公的崇敬與信仰，也可以看出關公在台灣人心中的地位。台灣何時開始有關帝廟的興建？又其在台灣的整體發展如何？而台南地區作為本島最早開發之處，其關帝信仰如何發展？有何特徵？本節嘗試以關帝廟階段性的建立，來粗略探究整個台灣關帝信仰的脈絡。

## 一、鄭清時期台灣的關帝信仰

鄭芝龍以海上貿易和海盜活動起家，崇禎元年（1628）降明之後，力量強大，控制閩海，雖荷蘭據台，亦弗敢違其意向。<sup>6</sup>清兵入關，鄭成功起而反清復明，以金、廈兩島，終非理想抗清基地，而台灣在何斌的說辭中：「沃野千里，實霸王之區；若得其地，可以雄其國；使人耕種，可以足其食。…移諸鎮兵士眷口其間，十年生聚，十年教養；而國可富，兵可強，進取退守，真足與中國抗衡也。」<sup>7</sup>故取台灣為根本之地乃為當務之急。永曆十五年（1661），鄭成功出兵攻台，翌年二月中荷蘭投降，鄭成功正式入據台灣。<sup>8</sup>

民俗宗教是臺灣漢人移民的精神依託。因移民渡海歷經風濤之險，登岸則要面對疫癘番害之苦，為得精神安寧必求之於固有的宗教信仰。隨著鄭氏政權在台建立，閩粵兩省移民來台者人數日漸增多，為鞏固政權及滿足民間祈安植福的心理，寺廟的建置亦逐漸增加。<sup>9</sup>其中，關聖帝君原是明朝官方崇祀的重要對象，故鄭經時即已建廟。<sup>10</sup>加上來台士兵和移民當中，有不少是關帝的信徒，因此鄭

<sup>6</sup>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史》（台北：眾文圖書，1996年），頁139。

<sup>7</sup> 江日昇，《臺灣外紀》（台北：臺銀文叢第60種，1959年），頁190。

<sup>8</sup>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史》（台北：眾文圖書，1996年），頁140~146。

<sup>9</sup> 邱麗娟編纂，《續修台南市志卷二人民志 宗教篇》（台南：台南市政府，1996年），頁4。

<sup>10</sup> 蔡相輝，〈台灣的關帝信仰及其教化功能〉（盧曉衡主編《關羽、關公和關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168。

氏時期的台灣雖屬初關，但據後來清代相關府志記載，當時已有九座的關帝廟宇分布在今台南縣市地區。整理列表如下：

表 3-1 鄭氏時期台灣關帝廟一覽表

編號	廟宇坐落地點	最早相關文獻記載
1	鎮北坊（西定坊、寧南坊）（今台南市中區）	《臺灣府志》（蔣志）
2	西定坊港口，俗稱小關帝廟（今台南市中區）	《臺灣府志》（蔣志）
3	許厝甲（今台南市東區）	《臺灣縣志》
4	保舍甲（今台南市東區）	《臺灣縣志》
5	長興里（今台南縣永康、仁德鄉之各一部）	《臺灣縣志》
6	新豐里（今台南縣關廟、龍崎鄉之各一部）	《臺灣縣志》
7	善化里目加溜灣（今台南縣善化鎮及玉井、大內鄉）	《臺灣府志》（高志）
8	土墾埤保（今台南市中區）	《臺灣府志》（蔣志）
9	安平鎮（今台南市安平區）	《臺灣府志》（高志）

資料來源：整理自蔣毓英《臺灣府志》，頁 119；高拱乾《臺灣府志》，臺銀文叢本，頁 210~212；、  
陳文達《臺灣縣志》，臺銀文叢本，頁 212~213。

除了關帝廟之外，鄭氏時期還有許多供奉其他神祇的廟宇。如漳、泉移民奉祀的鄉土神保生大帝，朱明政權的守護神玄天上帝，司理陰獄的城隍信仰及庇祐航海安全的媽祖等。據賴永祥在〈明鄭時期臺灣開發梗概〉一文中的統計，將當時的祀神及廟址列表如下：

表 3-2 鄭氏時期台灣寺廟一覽表

主祀神	廟數	廟址
關帝	9	①鎮北坊②西定坊③土墾埕④安平鎮⑤永康里許厝甲⑥永康里保舍甲 ⑦新豐里⑧長興里⑨目加溜灣
玄天上帝	8	①東安坊②鎮北坊③永康里下洲仔甲④永康里洲仔尾網寮⑤廣儲東里 ⑥仁和里下灣⑦崇德里⑧大目降
保生大帝	6	①西定坊②鎮北坊③安平鎮④土墾埕⑤大目降⑥歸仁北里舊社口
玉皇太子	4	①鎮北坊②西定坊③土墾埕④長興里
觀音	3	①鎮北坊②寧南坊③廣儲東里
田祖(五穀 神農)	2	①廣儲西里②保大西里
城隍	1	①東安坊
馬王(公)	1	①東安坊
倪聖公	1	①總管宮
陳稜	1	①東安坊
王公	1	①長興里
媽祖	1	①自強街
東獄	1	①東安坊
彌陀	1	①永康里
其他	2	①萬福庵：鎮北坊②龍湖巖：六甲

資料來源：賴永祥，〈明鄭時期台灣開發梗概〉（《臺灣風物》11 卷第 3 期，1962），頁 23~24。

從上表中可以很明顯的發現，鄭氏時期台灣的眾多神廟中，關帝廟的數目最多，甚至超越朱明和鄭氏的守護神玄天上帝。可知此時的關帝信仰一開始在台灣的發展就有相當的重要性，這應是延襲大陸地區關帝崇拜之盛況。

鄭氏政權以現今台南縣市地區為其統治核心，並在此駐兵開墾。來自閩、粵的移民也較早在此落地生根。這些漢人不僅將生活方式引入台灣地區，同時也帶來他們在原鄉的信仰。使得在大陸地區早已普遍被奉祀的關聖帝君崇拜，開始進入與發展。而當時的政治中心承天府，正是台灣最早興建關帝廟之處，也是台灣地區關帝信仰發展的重要源頭。

清朝攻克台灣，雖曾一度以台灣到底應棄應留而廷議不決，後來在施琅力爭下，康熙二十三年（1684），乃劃台灣為一府三縣，隸福建省。<sup>11</sup>有清一朝統有台地二百多年中，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統治較為消極，甚至有「渡臺禁令」限制大陸人口移入，但對於有經濟困難的閩粵居民言，這仍是一個值得冒險前來的新天堂。所以來臺漢人更多，開墾的速度也更快，而官方也不得不適時調整行政區劃，以肆應人口增多管理的需求。從一府三縣的規制到最後台灣正式建省，今日台灣傳統的風俗節慶和寺廟信仰在此階段大抵發展完備。

關帝的信仰在清代的發展更是快速。清朝的皇帝對關聖帝君的尊崇，比起前代也有一步步提升的趨勢，“順治元年，定每歲五月十三日致祭。九年，敕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sup>12</sup>雍正時，更把祀典的層級提高。“雍正三年，命天下直省郡邑皆行建立關聖大帝全廟，並於春秋兩季祭乙太牢。雍正五年，命全國各地供奉關公者，須正屋正座。雍正八年，再詔改“關帝廟”為武廟，於五月十三日誕期特祀。從此開始，關公已與至聖先師孔子並列，一武一文：“孔子祀天下學宮，而關帝廟食遍薄海內外”。雍正十二年，又御制關帝廟後殿的《崇祀三代碑文》。文中更進一步，以“神”稱呼關羽，並將其曾祖封為“光昭公”，其祖為“裕昌公”，其父為“成忠公”，製成木主，供奉於後殿。<sup>13</sup>從這些積極面的做法來看，清代皇帝們對關帝的崇奉是不遺餘力的。

清代朝廷何以如此重視並努力提升關帝的地位，主要是出於神道設教的政治考量，透過倡導關帝的忠義精神來鞏固政權、保國靖民：

---

<sup>11</sup>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史》（台北：眾文圖書，1996年），頁241~243。

<sup>12</sup> 王必昌，《重修台灣縣志》（台北：臺銀文叢第113種，1961年），頁169。

<sup>13</sup> 朱法源，〈“關公”在政治思想上的地位〉（盧曉衡主編《關羽、關公和關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204。

“昔先王以神道設教也，蓋以功德及民與夫捍災禦難者，尊崇而奉祀之，所以崇德報功，彰善癉惡也。我朝歷聖相成，攸崇祀典，神亦顯靈效順，輔翼皇圖；每見奏報之中，筆難盡紀，然其威靈顯著，功德昭然者，為關帝、天妃為最著。”<sup>14</sup>

先賢先烈得以成神為天子所祀，除了其本身立下的功勞外，還被寄予厚望能透過如此的彰善懲惡以利於教化萬民。而國家對神的尊崇越高，神也會顯靈以佑之，尤其關帝、媽祖更是其中最威靈顯著者。

臺灣本為移墾社會，加上清初海禁政策影響，社會上早已因互助需要而形成結盟拜把之風。<sup>15</sup>通常結拜者會一齊到關帝廟，在關帝神像之前虔誠膜拜，請關帝做見證，仿效桃園結義，彼此親如兄弟不得有貳心。<sup>16</sup>而臺灣民變的發生也多與結拜有關，如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之役等。在官方與反抗者皆崇奉關帝的情況下，最終關帝仍是顯聖協助正統政權。《清一統志臺灣府》中這樣記載：

臺灣縣附郭。城東門樓上，舊祀關帝。乾隆五十三年，臺匪林爽文等滋事，官軍渡海，咸睹神像，尋即蕝功。<sup>17</sup>

故乾隆五十四年（1789），知府楊廷理在林爽文事件後，重新修建關帝廟，並有「重修郡西關帝廟碑記」。在碑記中，他提出府城之所以能重新收復是關帝保佑所致，“顧若台灣各邑，遞為賊所陷，而府城獨以神故得全，且不旋踵而所陷盡復，此神所以獨靈於府城也歟！”<sup>18</sup>林爽文事件對官方的衝擊頗大，但憑藉著對關帝信仰的堅定與尊崇，關帝終顯神威助國朝而退亂賊。所以祀典愈隆，庇祐也愈多，因此對待關聖帝君這一位神祇也就得更用心。

<sup>14</sup> 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台北：臺銀文叢第 37 種，1959 年），頁 58。

<sup>15</sup> 謝國興，《官逼民反》（台北：自立晚報，1993），頁 48。

<sup>16</sup> 施哲雄，〈從臺北的行天宮看關公在臺灣民間社會的影響〉（盧曉衡編《關羽、關公和關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2），頁 150。

<sup>17</sup> 《清一統志臺灣府》（台北：臺銀文叢第 68 種，1960 年），頁 4。

<sup>18</sup>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台北：臺銀文叢第 140 種，1962 年），頁 515。

隨著關帝廟被重視並列為祀典，把祭祀層級提高後，地方官員每月初一、十五均需前往行禮，如鳳山知縣王瑛曾在《重修鳳山縣志》的「重建關帝廟碑記」中即描述出此一盛況：

邑城東廂壯繆侯廟，迄今稱武廟。凡長官行部、令宰朔望俱修展謁禮，蓋祀典之鉅者。<sup>19</sup>

因此，在官方因虔信持續的提倡關帝信仰之下，當時台灣的府縣廳治均有武廟之修建，且視之為地方的要事。如在《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臺北地方建造衙署廟宇等動用工料地價銀兩請 20 部立案准予彙〉的奏摺中即提到，為了護佑眾生，有些地方祠廟是在所必建，關帝廟當然也包括在內。

地方廟祀有關帝廟、天后宮、大士殿、風神廟、龍神廟，沿海胥資護佑，尤不可缺；並經興建，次第葺工。<sup>20</sup>

以關帝扮演官兵保護神的角色來說，清代的軍人們更是崇信關帝的另一主要族群。當初施琅平台之時，據其所述除媽祖及觀音曾一顯神蹟助其一臂之力外，關聖帝也曾托夢示兆：“初，琅將出師…軍士有宿于關壯繆廟者，忽聞空中呼曰選大五十杆，助施將軍破賊。琅聞之，益自喜。至是，果驗”<sup>21</sup>所以清廷平台駐軍澎湖不久後，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即由澎湖協鎮尙宣建廟奉祀關帝，此即澎湖武廟的由來。另外成書於道光年間蔣鏞的《澎湖續編》〈卷上 地理紀/祠廟〉的紀錄中，也提到前述之關帝廟。從乾隆年間的增修，到日後陸陸續續幾次的修建，幾乎全由當地軍營守將所主導，從此便可得知軍人之崇祀關帝甚隆。<sup>22</sup>而

<sup>19</sup>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台北：臺銀文叢第 146 種，1962 年），頁 374。

<sup>20</sup> 《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台北：臺銀文叢第 276 種，1969 年），頁 178。

<sup>21</sup> 余光弘，《媽宮的寺廟》（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8 年），頁 33。

<sup>22</sup> 「乾隆三十一年，前廳胡建偉會營增修。嘉慶七年，前廳王兆麟、黃家訓會同澎湖協聶世俊、左營游擊廖國、右營游擊陳光昭、署左營游擊王廷彪、把總黃定國勸捐重修。二十一年，前廳彭謙、潘觀光會同彭協郭繼青、陳夢熊、左營游擊陳鵬飛、右營游擊吳得勳、左右營守備周萬



在臺地所駐紮的陸軍營盤為崇奉關帝，也都有建廟奉祀。如陳文達在《臺灣縣志》〈卷九 雜記志〉寺廟中的記述“關帝廟，在道標營盤。開闢後，合標同建。”<sup>23</sup>周鍾瑄在《諸羅縣志》中也有提到，位於嘉義縣縣署東北角的關帝廟，正是由軍官所修建的：“關帝廟 一在縣內東北角，康熙五十二年參將翁國楨建；五十四年，參將阮蔡文、守備游崇功成之。”<sup>24</sup>

關帝信仰從開始進入臺地發展至此，因著官方的積極倡建及軍人的建廟奉祀，全台各地新建的關帝廟宇陸續出現：從台灣縣、澎湖廳、鳳山縣、嘉義縣、彰化縣、苗栗縣、淡水廳、新竹縣、台北府、噶瑪蘭廳等均有。<sup>25</sup>據清代所修纂的志書記載，當時全台新建之關帝廟約有三十四座：

表 3-3 清代台灣新建關帝廟一覽表

編號	地點	設立年代與背景	最早記載文獻
1	道署左	康熙年間道標營眾建	《臺灣縣志》
2	保大東里	康熙五十六年鄉人同建	《臺灣縣志》
3	法華寺左	乾隆五十七年郡守楊廷理新建	《續修臺灣縣志》
4	縣署東北角	康熙五十二年參將翁國楨建	《諸羅縣志》
5	媽祖宮西	康熙三十六年澎湖副將尚宣建	《臺灣縣志》
6	澎湖吉貝嶼	應在康熙年間為兵丁所建 <sup>26</sup>	《臺灣府志》(高志)

清、阮朝良、千總詹功顯、盧世興、張正、賴啓泰等復行勸捐修葺。道光五年，護協沈朝冠、左營游擊黃步青、右營游擊蕭得華、左右營守備周天成、周承恩偕通判蔣鏞勸捐重修。」蔣鏞，《澎湖續編》(台北：臺銀文叢第 115 種，1961 年)，頁 4。

<sup>23</sup> 陳文達，《臺灣縣志》(台北：臺銀文叢第 103 種，1961 年)，頁 210。

<sup>24</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台北：臺銀文叢第 141 種，1962 年)，頁 281。

<sup>25</sup> 蔡相輝，〈台灣的關帝信仰及其教化功能〉(盧曉衡主編《關羽、關公和關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頁 172~174。

<sup>26</sup> 因高拱乾所修纂的《臺灣府志》約成書於康熙 35 年，故推論此作廟宇至少創建於康熙 35 年之前。而位於瓦硯港的廟宇亦同。

7	澎湖瓦碇港	應在康熙年間為兵丁所建	《臺灣府志》(高志)
8	興隆莊	年代背景不詳，但應創建於康熙年間 <sup>27</sup>	《鳳山縣志》
9	永寧里	年代背景不詳，但應創建於康熙年間	《鳳山縣志》
10	半屏山大灣	康熙年間由里民募建	《鳳山縣志》
11	大竹橋	康熙年間由里民募建	《鳳山縣志》
12	縣治東門內	雍正五年知縣蕭震建	《重修福建臺灣府》
13	中衝崎莊	乾隆年間由里民募建，同治二年黃通義重建	《重修鳳山縣志》
14	阿侯街(港西)	乾隆四十五年董事郭萃、王廷魁建	《鳳山縣采訪冊》
15	五塊厝莊北(大竹)	創建莫考，約於嘉慶、道光年間興建 <sup>28</sup> 。咸豐九年副將曾元福修	《鳳山縣采訪冊》
16	港埔莊(大竹)	約於嘉慶、道光年間興建，咸豐八年總理孫裕重建	《鳳山縣采訪冊》
17	挖仔莊(嘉祥)	建於嘉慶、道光年間，道光二十六年洪泉光重建	《鳳山縣采訪冊》
18	赤山莊(赤山)	創建年代不詳但應於光緒前，光緒九年阮興隆重修	《鳳山縣采訪冊》
19	大莊(嘉祥)	創建年代不詳但應於光緒前，光緒元年陳僚重修	《鳳山縣采訪冊》
20	縣治南門內	雍正十三年邑令秦士望捐建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
21	鹿港王宮邊	乾隆三十七年南境商民捐建	《彰化縣志》
22	鹿港文昌祠邊	嘉慶十七年同知薛志亮捐建	《彰化縣志》
23	廳治西，文昌宮前	嘉慶十三年居民原祀在米市街，二十三年文	《噶瑪蘭廳志》

<sup>27</sup> 此座關帝廟的紀錄在前述的高志中並未得見，直到康熙 59 年成書的《鳳山縣志》才見記載，故筆者推論其應該建於康熙後期或此時規模稍具。位於永寧里的廟宇亦同。

<sup>28</sup> 根據相關志書《續修鳳山縣志》、《鳳山縣采訪冊》紀錄的時間點比對來推論，筆者認為此座廟宇的創建年代大約是在嘉慶、道光年間。位於港埔莊的廟宇亦同。

	殿	昌廟落成日，通判高大鏞移奉同在前殿。	
24	員潭子莊	嘉慶九年陳國興等倡建	《苗栗縣志》
25	石圍牆莊	嘉慶二十四年墾戶吳琳芳倡建	《苗栗縣志》
26	銅鑼灣街	光緒十六年生員邱國霖、吳湯興捐建	《苗栗縣志》
27	大湖八份街	光緒十四年統領林朝棟建，由墾戶維持	《苗栗縣志》
28	竹塹城東門內	創建年代背景不詳，推估約在雍正、乾隆初年間 <sup>29</sup>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
29	富興莊	光緒十六年莊民捐資創建	《樹杞林志》
30	上斗換坪街管內 內灣莊	嘉慶二十五年建	《新竹縣志初稿》
31	三灣街管內大南 埔莊	道光二十五年建	《新竹縣志初稿》
32	廳治南門內	乾隆四十一年同知王右弼建	《淡水廳志》
33	興直堡新莊街	乾隆二十五年貢生胡焯猷建	《淡水廳志》
34	台北府文廟之左	光緒十四年劉銘傳撫台時創建	《劉銘傳撫台前後檔案》

資料來源：臺銀文叢志書<sup>30</sup>及陳妍希，〈關公信仰與台灣宗教關係的研究〉碩士論文，頁 42~44。

經由以上這些清代台灣地區增建關帝廟的統計資料，我們可以約略得知當時關帝廟發展的一些概況。而為了能更清楚看出清代關帝廟的建立是否有區域性的差別，及從廟宇在不同時代的倡建，是否反映關帝信仰的發展趨勢，筆者另將之依時間的發展先後，整理一表如下：

<sup>29</sup> 劉良璧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成書於乾隆六年，而康熙年間所修纂的志書均未見紀錄，故筆者推論其創建應於此一階段或此時規模較具。

<sup>30</sup> 這些志書包括有：《臺灣府志》（高志）、《臺灣縣志》、《諸羅縣志》、《鳳山縣志》、《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重修臺灣府志》、《重修臺灣縣志》、《重修鳳山縣志》、《福建通志臺灣府》、《續修臺灣府志》、《續修臺灣縣志》、《彰化縣志》、《噶瑪蘭廳志》、《淡水廳志》、《臺灣通志》、《新竹縣志初稿》、《苗栗縣志》、《鳳山縣采訪冊》、《樹杞林志》、《苑裏志》、《恆春縣志》、《澎湖紀略》、《臺灣通史》、《劉銘傳撫台前後檔案》等。

表 3-4 清代新建關帝廟時間分布表

時間	康熙年間	雍正、乾隆年間	嘉慶、道光年間	咸豐、同治年間	光緒年間
分布地區	臺灣縣 (1、2) 諸羅縣 (4) 澎湖廳 (5~7) 鳳山縣 (8~11)	臺灣縣 (3) 鳳山縣 (12~14) 彰化縣 (20、21) 新竹縣 (28) 淡水廳 (32、33)	鳳山縣 (15~17) 彰化縣 (22) 噶瑪蘭廳 (23) 苗栗縣 (24、25) 新竹縣 (30、31)		苗栗縣 (26、27) 新竹縣 (29) 台北府 (34)
合計	10	9	9	0	4

資料來源：整理自前表 3-3 及蔡相輝〈關帝廟由來及發展情況〉（魏淑貞編《關聖帝君》，台北：自立晚報，1994），頁 12~16。

說明：1. 此一表中的編號，為前表 3-3 清代臺灣新建關帝廟的編碼代號。  
2. 鳳山縣的 18、19 二座關帝廟建廟年代不詳，但於光緒年間重修。

以時間分布來看，清代所增建的關帝廟大多集中於康、雍、乾到道光年間。從空間分布來看則可以明顯發現，官修武廟集中於省會和府縣廳治，官兵倡建者則分布於駐軍處所，而民間所私建者多隨拓墾活動的推展，在聚落所在地出現。由此可以推論，清代台灣關帝廟的信奉群體主要有三大類：一為官員、一為軍人、另一為民眾。且關帝廟的發展與臺地拓墾腳步是密切相關的，隨政治中心的設置、軍人的屯駐及民眾的入墾，由南部開始逐漸達北部、宜蘭平原。臺灣關帝信仰發展至此階段，明顯從鄭氏時期只侷限於南部地區而至全台各地都有。

表 3-5 清代關帝廟倡建者與時間的關係表

時間		康熙年間	雍正、乾隆 年間	嘉慶、道光 年間	咸豐、同治 年間	光緒年間
倡建者	軍人	1、4、5~7	--	--	--	27
	官員	--	3、12、20、 32	22	--	34
	士紳	--	33	--	--	26
	里民	2、10、11	13、14、21	23~25	--	18、19、29
	不詳	8、9	28	15~17、30、 31	--	--

資料來源：整理自前表 3-3 及蔡相輝〈台灣的關帝信仰及其教化功能〉（《關羽、關公和關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171~175。

說明：此一表中的代碼為前表 3-3 中清代全臺關帝廟的編碼代號。

另外，這些廟宇的建立也都有其不同的背景，若由當時這些廟宇的倡建者不同身分來看，也可以顯現於不同時空各有其特色。康熙年間，關帝廟的倡建者大多為官兵或軍人，這與清廷將台灣收歸版圖，即於政治中心和軍事要地派駐班兵有密切關係。自大陸輪調來台的軍人將關帝視為軍神或武人守護神，於抵達駐地後即建關廟崇祀，有些武官甚至主動助修武廟。因此早期關帝廟的建立多與軍人有關即以此故。到雍正、乾隆年間，清廷在統治台灣一段時間後，政局大致穩定，關聖帝君既是國家的祀典，由官方建置寺廟崇祀責無旁貸，因此這時官員修建比例當然提高。從嘉慶以後到光緒年間，台灣西部和宜蘭地區拓墾完成，聚落穩定發展，民眾的經濟基礎較佳，民間也漸漸開始成為建置關帝廟的主要對象。此外，從表中也發現，官員及軍人們所修建的關帝廟明顯集中於嘉慶朝之前，確實顯現

清朝前期的國力強盛提供了官方提倡關帝信仰的最佳時機。但後來咸豐到同治期間的內憂外患使得官方對此一信仰似乎已無力兼顧，而民間的建廟活動在此階段也可能因無新的行政區劃及廟宇發展逐漸飽和，開始出現停滯的現象。直到光緒一朝，隨著建省與各地府縣廳治等新政治中心的設置，關帝廟才又重新出現新的發展，如苗栗縣及台北府的關帝廟建立即屬此例。

整體而論，關帝廟在台灣的出现始於鄭氏時期。當時鄭氏政權實際統轄的範圍雖然主要侷限於台灣南部，但大量官兵來台，加上將明朝祀典移植台灣及閩地移民帶來原鄉的信仰，所以關聖帝君的奉祀得以在台灣萌芽發展，整個鄭氏統治階段台灣地區即有多座關帝廟的設置。清代將台灣收編版圖後，官方和士兵對關聖帝君更加尊崇，不僅保存鄭氏時期所設置的關帝廟，更於統有台地的兩百多年間，在行政中心和駐軍之地新建許多的關帝廟。尤其在嘉慶朝以前，官方對建置及維護關帝廟更是不遺餘力。嘉慶朝之後，民間方面也隨拓墾的完成、聚落的繁榮，對關廟的設置日漸增多。經過鄭氏時期和清朝兩個階段的發展，在官方的推力及崇奉群體的努力下，關聖帝君已成為台灣民間信仰的重要部份。

## 二、日治與戰後台灣的關帝信仰發展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國力大進，為跳脫島國限制而極力向外擴張，甚至兼採所謂的「西進」、「南進」政策，故首當其衝者，西為朝鮮，南則台灣。清光緒二十年（1894），藉口東學黨之亂，出兵朝鮮，進而導至甲午戰爭的發生。次年，李鴻章與伊藤博文於日本下關議和，簽訂馬關條約，台灣從此為日人統治五十年。

日本據台之初，因軍務需要多佔領寺廟為駐紮地，對廟中的神具、佛像常有破毀之事，甚至將寺廟移作他用。<sup>31</sup>對接收台灣統治權的過程並不順利的日本人來說，此種影響台灣人民信仰甚鉅的做法，必然會引起非議及反彈。故為考慮台

---

<sup>31</sup> 據《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一書，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前後由總督府發文各地方調查寺廟用作兵營等事宜的資料中可以看出當時寺廟被挪做他用的情形相當普遍，如當時台南市的高公祠被當作台南辦務署使用，縣城隍廟被用作陸軍工兵隊等。

民感受，後來總督府遂發布諭告要求所屬必須尊重台民的基本信仰，<sup>32</sup>而往後歷任的台灣總督，對人民之通俗信仰乃至風俗習慣，也大多採行任其自然、政府不強干涉的態度。不過大正四年（1915）在臺南發生噍吧年事件（又稱西來庵事件）後，由於事件與祠廟齋堂的宗教信仰有關，因此台灣總督府在事件發生後即開始積極調查台灣當地的民間信仰狀況。大正七年（1918），日人第一次全島性的統計了台灣全部的廟宇，當時全台灣所有的寺廟總數共為 3476 座，其中關帝廟宇有 132 座，在全國所信仰的神祇中排名為第七位。<sup>33</sup>

表 3-6 大正七年（1918）全臺關帝廟的分布概況統計表

廳別	主祀神為關帝寺廟數	關帝在所有主祀神中的排名
臺北	5	9
宜蘭	9	6
桃園	4	7
新竹	21	6
臺中	13	9
南投	7	6
嘉義	31	7
臺南	29	7
阿猴	3	9
臺東	--	--

<sup>32</sup> 明治二十九年（1896）八月，以台灣總督之名義頒發諭告如下：本島在來之寺廟宮寺院等，在其創建雖有公私之區別，總之是信仰尊從之結果，又是德義之標準，秩序之淵源，治民保安上不可或缺者也。故目前軍務倥傯之際，出其不得已雖有一時暫為軍用，切勿損傷舊觀，需要特別注意。就中如破毀神像，散亂神器等所為，苟且斷不許之。自今以後需小心注意保存，如果暫供軍用者，需火速回復舊態，此旨特為諭告。瞿海源編纂，《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三 住民志宗教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頁 997。

<sup>33</sup> 余光弘，〈台灣地區民間宗教的發展—寺廟調查資料之分析〉（《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53 期，1982 年），頁 81。

花蓮港	1	2
澎湖	9	4
合計	132	7

資料來源：整理自蔡相輝、吳永猛編《臺灣民間信仰》，頁 46。

從這次的調查資料可以發現，前一階段鄭清時期統治時，所有可見到有紀錄的關帝廟大約也只有四十幾座，而時隔不過二十年左右，日人的統計資料卻暴增了近三倍左右。這個原因可能是因為一方面日本人的調查統計比較確實而全面，與清代在修志書時常是抄錄一些先前所修志書而少重新調查有關。另一方面在清代的志書中所紀錄的寺廟，多是規模較大或較具代表性者，並集中在行政和軍事中心，忽略規模較小或偏遠地區的民間廟宇，故所得資料並非全面性的。第三是另一種信仰類型—鸞堂，在清末逐漸進到台灣地區，不管是崇奉「三聖恩主」或「五聖恩主」，關聖帝君大都被視為主神奉祀，此類堂廟方志並不採計，故日治實施調查所得主祀關帝的廟宇數目因而激增。

表 3-7 昭和九年（1934）全台灣關帝廟分布概況統計表

地區	主祀神為關帝寺廟數	關帝在所有神祇中的排名
臺北州	16	8
新竹州	28	5
臺中州	21	9
臺南州	51	7
高雄州	30	7
澎湖、花蓮港、臺東三廳	11	4
合計	157	6

資料來源：江燦騰主編、增田福太郎原著《臺灣宗教信仰》，頁 109~123。



昭和九年底（1934），據增田福太郎在《臺灣の宗教》一書中的統計資料則顯示，全島寺廟總數共為 3662 座，其中關帝廟宇有 157 座，分別為：台北州 16 座、新竹州 28 座、台中州 21 座、台南州 51 座、高雄州 30 座、澎湖、臺東及花蓮港廳 11 座。<sup>34</sup> 比起前次的統計數據，這十幾年間全島寺廟數有小幅的增加，而關帝廟的數目也有明顯的成長，且主祀神的排名升為第六位。若單從日治時期的這二次調查資料來分析，可以見到的是在日人的前期統治政策中，基本上對宗教的發展應該是採取較寬容的態度。所以從這二次的調查結果中，仍能看出台灣地區的民間信仰雖然歷經統治政權的轉換，還是有一定的發展空間。

昭和十二年（1937）中日戰爭爆發後，台灣總督府因恐台人支持中國抗日，所以致力於切斷台地與中國之間的聯繫，而開始全力推動「皇民化運動」。其中包括授權地方政府開始整頓寺廟，使台灣地區的民間信仰面臨了一大考驗。通過寺廟整理原則的頒布與施行，尤其以新竹州中壢郡之寺廟整理的聲勢最大。<sup>35</sup> 至昭和十七年（1941）止的統計，全島被整理的寺廟頗多，被廢毀者計有 361 座，移作他用者則有 819 座。<sup>36</sup>

表 3-8 昭和十七年（1941）止全臺被整理寺廟統計表

地區	寺廟廢毀數	寺廟移作他用數	神像燒毀數	神像沒收數
台北州	1	1	--	37
新竹州	40	188	409	1859
台中州	41	26	30	237
台南州	194	419	9749	1268

<sup>34</sup> 江燦騰主編、增田福太郎原著，《臺灣宗教信仰》（台北：東大書局，2005），頁 109~123。

<sup>35</sup> 昭和十二年之前，新竹市、彰化市、嘉義市亦曾著手整理，但規模不大，影響不深，至昭和十三年中壢郡之寺廟，整理聲勢最大，理論及實行上亦甚徹底。瞿海源編纂，《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三 住民志宗教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年），頁 1003。

<sup>36</sup> 蔡相輝，〈近代化與臺灣的民間信仰〉（《臺灣文獻》，51 卷第 2 期，2000 年），頁 238~239。

高雄州	75	179	3266	617
台東廳	9	6	270	61
花蓮港廳	1	--	2	--
澎湖廳	--	--	--	--
合計	361	819	13726	4069

資料來源：蔡相輝，〈近代化與臺灣的民間信仰〉（《臺灣文獻》51 卷第 2 期，2000 年），頁 238~239。

其中關聖帝君廟被毀者有：新竹州 10 座、台中州 2 座、台南州 35 座、高雄州 10 座，總共 57 座，佔全台關聖廟總數的 41%。<sup>37</sup>如果以區域性的分布來看，台南州所受到的衝擊最大，其次為高雄州及新竹州。不過台南州及高雄州的關帝廟被毀廢的如此之多，除了寺廟整理運動外，市區的改正、道路的開闢也是另一原因。因此在寺廟整理運動中，大概只有部分的地區受影響較深外並未波及全台，不過有這麼多的關帝廟被毀廢，關聖帝君的信仰無可避免的受到相當大的挫折，可知政治力的介入對民俗宗教的發展還是有其一定的左右力量。

總的來說，日治時期整體臺灣地區的宗教信仰，在前期官方採放任不干涉的情況下，仍有部分發展空間，而關帝廟的建置也在持續之中。到了統治後期，因中日戰爭爆發的關係，日人政治力開始介入干涉，關聖帝君的信仰本在鄭清階段是被官方所極力推崇的，並為國家的重要祀典，但在日人據臺之後，關聖帝君也只能淪為與一般信仰無異的台灣民俗宗教中眾多神祇之一。再則，日人由於統治上的考慮，積極調查整理臺灣地區的風俗舊慣，並大規模查訪了全部的寺廟，使得我們對所有民俗宗教，包括對關聖帝君的崇信，均可從此一量化資料中得到更詳細的一些概念，從而有助於整體信仰發展脈絡的分析。不過，日人在宗教上採取了「抑道揚佛」的原則，促使原本在第一次統計中數量極少的佛教寺院在短時間內有極快速的增加。<sup>38</sup>也自此影響了台灣地區一般寺廟，所供奉的神像與儀式，

<sup>37</sup> 蔡相輝，〈關帝廟由來及發展狀況〉（魏淑貞編《關聖帝君》，台北：自立晚報，1994 年），頁 17。

<sup>38</sup> 余光弘，〈台灣地區民間宗教的發展—寺廟調查資料之分析〉（《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53 期，1982 年），頁 84。

呈現「佛道不分」的現象甚為明顯。關帝本來在道教界的地位頗為崇高又身兼佛教的護法伽藍，所以不論是為寺廟的主祀神或配祀神，在眾多佛、道廟宇中多可見到其被虔誠的膜拜。

中日戰爭爆發後（1937），歷經八年戰爭，臺灣脫離了日人的統治。戰後隨中華民國政府的遷台，許多大陸地區的宗教也因此進入了台灣地區，如一貫道、天德教、理教等。而原本的道教神廟也逐漸開始恢復舊觀，另外天主教及基督教的各個教派也積極深入各地傳教，台灣的宗教發展呈現出一片蓬勃的景象。台灣原有的民間信仰於此時也明顯的展現出幾個特色：一、新建的廟宇頗多，且建築之規模與裝飾愈加宏麗；二、寺廟祭典之風，因經濟狀況改善而日漸興盛甚有鋪張浪費之狀況；三、各廟宇的組織往往成為地方人士角力之處，多為政治勢力所控制。<sup>39</sup>雖然政府曾有一些寺廟政策想加以導正或限制，但仍無法影響民眾對宗教的熱情參與。

隨著信仰發展之蓬勃，民國四十八年（1959），台灣省文獻會調查了全省各地寺廟教堂等資料，當時全台共有寺廟宗祠等約共有 3834 座，其中關帝廟為 192 座，排名為各種神祇的第六位。以縣市別為統計，關帝廟的分布情形如下：基隆市 3 座，台北市 4 座，台中市 4 座，台南市 8 座，高雄市 13 座，台北縣 8 座，宜蘭縣 17 座，桃園縣 4 座，新竹縣 4 座，苗栗縣 15 座，台中縣 7 座，彰化縣 10 座，南投縣 11 座，雲林縣 15 座，嘉義縣 9 座，台南縣 16 座，高雄縣 12 座，屏東縣 10 座，澎湖縣 11 座，花蓮縣 6 座，台東縣 5 座。<sup>40</sup>

從本次調查，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宜蘭縣、苗栗縣、雲林縣及台南縣所建的關帝廟宇數量最多，其中分香火而祀的有不少，另外主要是鸞堂的大量出現，如宜蘭縣即有頗多的鸞堂。還有比較特別的是在廟宇的名稱上似乎存有地域性的差異，筆者在整理宜蘭地區的關帝廟宇中發現當地多稱為協天廟，另外在桃園地區也有類似的狀況，但從新竹縣以南則多被直接稱作關帝廟或文衡廟，這應是與移

<sup>39</sup> 瞿海源編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宗教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年），頁 1008~1009。

<sup>40</sup> 整理自劉枝萬，〈台灣省寺廟教堂名稱、主神、地址調查表〉（《台灣文獻》11 期第 2 卷），頁 37~236。

民來自漳州或泉州大有關係。<sup>41</sup>

往後台灣省政府民政廳陸續出版了幾年的《台灣省各縣市寺廟概況表》，各地方縣市政府的寺廟登記也在所修纂的地方志中紀錄有廟宇一覽表。從這麼多的調查統計數據，我們大概可以了解戰後台灣地區民俗宗教的發展概況，也發現主祀神為關聖帝君的廟宇數量之趨勢，以整體排名而論並無多大出入，大多為第七位左右。不過若以全部廟宇數目中所佔的百分比來看，卻有不斷增加的趨勢。

表 3-9 日治和戰後台灣地區關帝廟數目和百分比統計表

大正七年			昭和五年			民國四十九年			民國五十五年			民國六十四年			民國七十年		
排 名	寺 廟 數	百 分 比	排 名	寺 廟 數	百 分 比	排 名	寺 廟 數	百 分 比	排 名	寺 廟 數	百 分 比	排 名	寺 廟 數	百 分 比	排 名	寺 廟 數	百 分 比
7	132	3.8	6	157	4.2	7	192	5.0	7	192	4.5	7	334	6.2	7	356	6.4

資料來源：余光弘〈台灣地區民間宗教的發展〉（《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53 期，1982 年），頁 81。

民國八十一年（1992）台灣省文獻會出版的《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宗教篇，將全台灣地區（除了台北、高雄市外）的民間信仰及道教寺廟概況做了整理。這次統計使用的除了民國四十八年（1959）原有的資料外，另外還有七十一年（1982）民政廳的寺廟概況表，及七十二年（1983）各縣市政府的寺廟調查表，所以多少可以看出這些時間以來的一些變化。在此書中所紀錄的關帝廟數目總共為 374 座，以縣市別統計，分布情形如下：基隆市 5 座，台北縣 26 座，桃園縣 8 座，新竹市 3 座，新竹縣 9 座，苗栗縣 37 座，台中市 13 座，台中縣 9 座，彰化縣 29 座，南投縣 33 座，雲林縣 31 座，嘉義縣 16 座，嘉義市 6 座，台南市

<sup>41</sup> 林衡道，〈關帝信仰在臺灣〉（《臺灣風物》，26 卷第 2 期，1976 年），頁 42~43。

14 座，台南縣 27 座，高雄縣 30 座，屏東縣 18 座，宜蘭縣 27 座，花蓮縣 7 座，台東縣 11 座，澎湖縣 14 座。<sup>42</sup>

從這次的結果與民國四十八年（1959）的調查來看，全台關帝廟的建置明顯的增加快速，如果加上台北、高雄二個直轄市的廟宇數應該超過 400 座，也就是三十年來台灣地區的關帝廟增加了二倍之多。其中尤以台北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所增加的數目最多。因為這份調查資料中有附加寺廟的創建年代，所以筆者依時間先後將其整理成一表，其中除了年代未紀錄者和台北、高雄二市不列入統計外，其餘皆包括在內：

表 3-10 全臺關帝廟建廟的年代一覽表

縣市別	鄭氏	清代（1683~1894）	日治（1895~1945）	戰後迄今
基隆市	--	--	--	3
台北縣	--	4（1 乾隆：新莊）	5（1 民 26 後建）	4
桃園縣	--	1	--	3
新竹市	--	1（乾隆）	--	2
新竹縣	--	1	2	2
苗栗縣	--	8	18（2 民 26 後建）	3
台中市	--	--	1（民 26 後建）	3
台中縣	--	3	2	2
彰化縣	--	2（1 雍正 13：彰化市）	6（2 民 26 後建）	5
南投縣	--	3（1 乾隆 40：集集）	11	11
雲林縣	--	3（1 乾隆中：斗南）	10	12
嘉義市	--	1	--	3
嘉義縣	--	2	6	6

<sup>42</sup> 整理自瞿海源編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宗教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年），頁 1087~1379。

台南市	2 (祀典武廟、開基武廟)	4 (1 雍正 4)	1 (民 26 後建)	1
台南縣	1 (鹽水武廟)	10 (3 康熙年：關廟、白河、東山 1 雍正：麻豆 3 乾隆：關廟、將軍、學甲)	2	9
高雄縣	--	--	5 (1 民 34 建)	6
屏東縣	--	4 (1 康熙年：內埔 1 乾隆年：屏東市)	2	4
宜蘭縣	--	9	10 (1 民 34 建)	4
花蓮縣	--	2	2 (1 民 34 建)	3
台東縣	--	--	--	6
澎湖縣	2 (1 馬公市、 1 白沙瓦碇)	7 (3 康熙年：湖西、西嶼、白沙 2 乾隆年：湖西、西嶼)	3 (1 民 26 建)	--
合計	5	65 (20 : 45) <sup>43</sup>	86 (75 : 11) <sup>44</sup>	92

資料來源：瞿海源編纂，《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宗教篇，頁 1089~1311。

說明：為了討論方便，筆者將清代建於乾隆朝及之前者特別標示說明，另外日治階段採計的時間點為光緒 21 年後到民國 34 年間，並特別將民國 26 年中日戰爭後建廟者標示說明。

<sup>43</sup> 在此為筆者以乾隆朝為斷代所統計出的前後建立之廟宇數：乾隆朝及之前為 20 座；嘉慶初至光緒 20 年有 45 座。

<sup>44</sup> 此數據則以民國 26 年中日戰爭爆發為分界點，因戰爭之發生，日人開始在台推動皇民化運動，其一些政策對關帝廟的發展是有影響的，故以此區分之。光緒 21 年至民國 25 年間共建有 75 座；民國 26 年至民國 34 年止則建有 11 座。

從表 3-10 來看，其實多少已經可反映出整個台灣地區關帝信仰的發展脈絡。其中，可與前述鄭清時期關帝信仰情形參核印證之處有二：一、鄭氏時期雖統有台灣地區，但實際主要開發的區域除澎湖外，本島則多集中今台南、高雄一帶，所以全台關帝廟建廟時代於鄭氏階段者，也只在這些區域出現。二、清代早期官方在神道設教的考量下，要求各地方政府都要修建武廟來奉祀，再加上官兵每於駐軍之地私建關帝廟，因此除了接收前朝的關廟繼續奉祀外，至乾隆朝止各地又建置有 20 座的關帝廟。顯示臺灣的關帝信仰發展，初期在官方主導拓展的情勢下有一較好的基礎。自嘉慶初年以後到光緒二十年（1894）止，關帝廟又增建了 45 座之多，且絕大部分均為民間所興建。顯示從嘉慶朝之後，移民在開墾完成經濟好轉後，也努力建廟奉祀關帝。所以自清代中期以後，開始由民間接手扮演推動關帝信仰的角色。另外，如果和前面表 3-3 相對照下，清代所增建之關帝廟，據當時修纂的志書記載只有 34 座，而今人的紀錄卻有 65 座，頗有差異。其主要原因是，清代志書所記載的廟宇，多是比較重要或有規模者。而嘉慶朝之後，關帝廟的修建多為地方里民所負責。一般民間建廟，初期大都比較簡陋或只是粗建草寮奉祀而已，多要歷經一段時間的翻修、增建才會達到一定的規模，無法像官建的寺廟很早就能奠定相當的基礎。因此，經過時間的變化，在清代不見記載的廟宇，經過日治時期的調查及戰後政府的要求寺廟登記之下，資料會增多且較為明確。

又根據前表，日治和戰後台灣關帝信仰的發展，亦分別有其特色。在日人統治階段，其宗教政策有前、後期的差異。初期為了減少台灣人民的反抗，所以日本官方對宗教採取不干涉的態度，因此台灣人民仍能延續清代以來的信仰發展，此時關帝廟的建立仍是非常蓬勃，全台尚能增加有至少 75 座之多。不過其中有絕大部分是屬於一種新的信仰類型—鸞堂，這可能是因地方士紳們企圖能在異族統治和西力衝擊之下，藉由推動儒家教化的理想以保存固有文化，故以飛鸞勸化為主的鸞堂乃成為關帝信仰的另一種新趨勢。不過 1937 年中日戰爭發生後，日人開始推動寺廟整理運動及諸多行政措施促使台灣的民間信仰發生了變化，而在

這樣困難的處境下，台灣的關帝信仰當然也受到一些影響，除了有些寺廟被整理廢墮，或因都市計畫道路通過而被迫拆除遷建的之外，全台關帝廟增建的速度也大為減緩。

戰後宗教政策的鬆綁與自由，再加上 1960 年代以後台灣經濟快速的發展，又讓民間信仰又重新找回活力。全台各地的關帝廟如雨後春筍般的不斷增建，其中雲林縣、南投縣及台南縣地區增加最多，甚至東部的台東縣也都在這一時期增加了 6 座的關帝廟。可見經過長久以來的發展，關聖帝君在一般民眾心中早已不是皇權時代要教化百姓忠義精神的化身，相反的，祂已成為主要在滿足一般民眾祈福避禍、勸善懲惡的神祇。

### 三、台南縣市地區的關帝信仰概況

早期台灣地區的開發過程，大致依兩個方向進行。一是由南而北和由西而東，即西岸地區南部最早，依次為中部、北部和東部；另一發展方向則為由海岸推向內陸山地，今台南縣市則是此一發展過程中較早發達區。<sup>45</sup>

台南地區位居嘉南平原南部，南北有二仁溪及八掌溪，西為海岸線，背山面海。早期此區因沿海有眾多港口，方便了移民進入此區墾殖。在漢人入墾以前的台南地區，主要是西拉雅族的生存空間，包括居於平原地帶的新港、蕭壠、麻豆、目加溜灣四大社及平原東邊的大武壠四社。<sup>46</sup>永曆十五年（1661），鄭氏入主台灣後，置承天府、萬年縣和天興縣。為了解決隨之入台的二萬五千名大軍的糧食問題，及以此為據點謀復興之大業，而開始了在台灣屯墾政策，此舉也使漢人的拓墾範圍因而急速擴大。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領台之後，一度因鄭氏軍民內遷而人口銳減，但不久閩粵移民接踵而至，絡繹不絕，拓地日廣。康熙五十六年周鍾瑄的《諸羅縣志》是這樣描寫的：“諸羅自蔦松、新港至斗六門一百八

<sup>45</sup> 蔡文彩編纂，《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聚落篇（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87年），頁35。

<sup>46</sup> 趙文榮，〈清代台南地區的開發與社會變遷 1683~1895〉（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頁15。



十餘里，其間四里、九保，莊社鱗次；府治、縣治之左右上下，漢人有室家，田產以樂其生。”<sup>47</sup>由此可知台南地區的墾殖進展頗為迅速。

今台南縣市地區自荷蘭時期起，歷經鄭清兩階段，不但開發最早，而且又是臺灣的核心地帶，此區的關帝信仰自然有其重要性與特殊性。最早的關帝廟即建在台南地區，鄭氏時期臺灣所有的關帝廟均集中此處，有清一代也是關帝廟宇分布最多的區域。即便在日治時期的二次寺廟調查中，當時的台南州仍維持有最多的關帝廟。戰後，宗教政策更自由開放後，今日台南縣市全部的關帝廟合計也高達有五十幾座之多。據民國八十四年（1995）台灣省民政廳編印的《台灣省各縣市寺廟名冊》的資料，台南市所有 258 座的寺廟中共有 14 座的關帝廟，整理如下表：

表 3-11 民國八十四年（1995）台南市關帝廟調查表

編號	地區	寺廟	地址
1	中區	開基武廟	新美街 114 號
2	中區	關帝廳	友愛街 40 巷 11 號
3	中區	祀典武廟	永福路二段 229 號
4	東區	關帝殿	中華東路二段 96 巷 1 弄 1 號
5	東區	南天府	裕豐街 214 巷 25 號
6	東區	山西武聖宮	裕農路 661 巷 25 弄 2 號
7	東區	武玄宮	崇明十街 70 巷 6 號
8	東區	前甲顯明殿	裕農路 446 巷 45 之 2 號
9	南區	南府聖賢社聖懿堂	金華路一段 352 巷 97 弄 16 號
10	南區	省躬社聖化堂	灣裏路 88 巷 85 號
11	南區	怡峰殿舉喜堂	明興路 1087 巷 21 號
12	西區	金華府	神農街 71 號

<sup>47</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台北：臺銀文叢第 141 種，1962 年）頁 110。

13	安南區	文武聖廟	府安路五段 113 號
14	安平區	關帝聖堂	安平路 202 號

資料來源：台灣省民政廳編印，《台灣省各縣市寺廟名冊》，1995 年，頁 77~98。

而台南縣所有的關帝廟數目更多，從民國四十八年（1959）的〈台灣省寺廟教堂名稱、主神、地址調查表〉中，全縣 434 座寺廟內關帝廟計 16 座；統計資料截止於民國七十年（1981）左右的《重修台灣省通志》中，全縣 593 座寺廟內關帝廟占 27 座；民國八十四年（1995）台灣省民政廳編印的《台灣省各縣市寺廟名冊》全縣 928 座寺廟中關帝廟有 41 座。由上述資料可以看出台南縣關帝廟成長的快速。可見，在各地民俗宗教蓬勃發展潮流當中，關帝信仰也是與時俱進保持一貫的成長趨勢。

表 3-12 民國八十四年（1995）台南縣的關帝廟調查表

編號	地區	寺廟	地址
1	新營	三聖宮	復興路 305 巷 21 之 1 號
2	新營	南宮直轄院聖教堂	民治路 78 之 7 號
3	新營	覺慧心舍	土庫里土庫巷 71 之 200 號
4	鹽水	福安宮	福得里 8 鄰後厝 14 號
5	鹽水	南天宮	大豐里 9 鄰大豐 88 號
6	鹽水	武廟	武廟里 4 鄰武廟路 87 號
7	柳營	明聖殿	重溪村小腳腿 12 鄰 123 號
8	柳營	明聖宮	光福村 25 鄰 132 之 4 號
9	後壁	和安宮	竹新村 15 鄰 33 號
10	後壁	德馨宮	墨林村 13 鄰 321 號
11	後壁	合竹壇	土溝村 13 鄰 135 號

12	後壁	開天府	嘉田村 5 鄰 48-15 號
13	學甲	煥昌廟	煥昌里 82 號
14	將軍	文衡殿	忠興村 20 鄰 196 號
15	將軍	聖帝殿	西和村 9 鄰 79 之 1 號
16	白河	馬稠後關帝廟	草店里 10 鄰 130 號
17	白河	鎮安宮	六溪里 11 鄰 106 之 1 號
18	白河	武聖殿	永安里 18 鄰新厝仔 70 之 24 號
19	仁德	忠義宮	一甲村忠義路 1 號
20	仁德	清寧宮	仁義村中正路 414 號
21	佳里	育善堂	安西里 118 之 3 號
22	佳里	聖帝殿	忠仁里 14 鄰 112 號
23	佳里	南天忠義堂	頂廓里 89 號
24	玉井	關帝爺廟	望明村 144 號
25	關廟	山西宮	關廟村文衡路 51 號
26	關廟	深坑山西宮	深坑村 3 鄰 84 號
27	關廟	埤頭關帝廟	埤頭村 62 之 1 號
28	關廟	下湖關帝廟	埤頭村 1 號
29	七股	文衡殿	城內村 3 鄰城內 19 號
30	七股	聖帝廟	篤加村 1 鄰
31	七股	篤加玉勒文衡殿	篤加村 5 鄰篤加 54 號
32	麻豆	文衡殿	南勢里 3 鄰關帝廟 23 號
33	新市	聖帝殿	大洲村 20 之 2 號
34	東山	玉華宮	青山村 2 鄰 147 號
35	東山	天皇宮	青山村 6 鄰 58 號
36	歸仁	看西武聖宮	看西村 12 鄰看西 83 號
37	歸仁	文衡聖帝堂	許厝村仁愛街 38 號

38	西港	聖帝宮	劉厝村 8 鄰 58 號
39	官田	復興宮	隆本村 496 號
40	楠西	伍龍殿	灣丘村香焦山 31 之 12 號
41	新化	五佛宮	礁坑里州六崙 116 之 1 號

資料來源：台灣省民政廳編印，《台灣省各縣市寺廟名冊》，1995 年，頁 511~584。

在台南地區如此多的關帝廟宇中，筆者嘗試去分析出此一信仰的重要特色，不過從這些官方所統計、調查的資料裏，有關建廟年代的紀錄往往前後出入頗大，甚至有鄭氏時期與康熙晚年之差異。據余光弘的說法，一般廟宇創建年代常會出現混亂、混淆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廟方通常會傾向將寺廟年代早報些，一是調查人員隨意抄寫匾額時，誤將重修年代認為是創建年代，導致廟齡大為縮短。<sup>48</sup>所以在討論這些廟宇的時代差異時，頗有些困難度。

但在將這些資料相互比對之下，除了年代不詳者不列入討論外，仍然可約略看出其發展特色。有關台南市部分將於後文詳細討論，在此先就台南縣情況說明如下：一、全台南縣約有近 10 的座關帝廟是建於鄭清時期，其中絕大部分又多為康、雍、乾階段即已建立，如編號 6、14、19、20、25、32、34 等，這些關帝廟的坐落位置也都分布於較早開發之區域。二、在前期的建廟過程中，官方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鹽水的武廟為康熙年間台澎兵備道梁文科所倡建，關廟的山西宮則由巡道蔣允焄於乾隆年間興建，而東山的玉華宮更是用林爽文亂後的補助款項建成的，可見清政府延襲其一貫政策，對關帝信仰多加倡導，而官兵亦盛行崇拜關帝，從台南縣的發展也可以看出此一趨勢。三、日治時期全縣的宗教信仰受到影響，寺廟增建的速度相當緩慢，<sup>49</sup>新增的關帝廟只有 4 座數目不多，分別是鹽水的南天宮、七股的文衡殿、後壁的德馨宮及後壁的合竹壇，且興建之年代均在寺廟整理運動之前。此外，也有廟宇在此階段是因道路修建而被拆除的如柳營

<sup>48</sup> 余光弘，〈台灣地區民間宗教的發展—寺廟調查資料之分析〉（《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53 期，1982 年），頁 75。

<sup>49</sup> 當時據統計全縣在日治階段的五十一年統治中，只建立了 35 座寺廟。石睢陽等纂修《臺南縣志》卷九雜誌（台南：台南縣政府，1980 年），頁 54。

的明聖宮。四、其餘未討論的的廟宇，多為戰後所建尤其是民國 60、70 年代左右，可見戰後宗教政策的對民俗宗教開放及經濟活動的蓬勃，使人們對宗教信仰的需求更為迫切，促使了關帝信仰也隨之有更大發展空間。

整體而論，初步觀察台南縣的關帝信仰和台灣地區的發展脈絡大致相符，只是如果能更深入以單一區域去探究對關帝信仰的內涵與特色，必有更深入的了解，所以筆者在下面的章節中，將更縮小區域範圍以台南市為核心來一窺關帝信仰的種種面向。



## 第二節 鄭清時期台南市的關帝信仰

台南市域舊名赤崁，原為西拉雅平埔族赤崁社又稱新港社的社域，明萬曆年間即有福建泉州移民蹤跡。後歷經荷蘭人建城，獎勵中國商人移往而逐漸形成繁華街市，鄭氏時期改赤崁為承天府，為當時治台行政中心，至清領二百餘年均為首府所在，並成為清代全台最大城市及商業集散中心。<sup>50</sup>

### 一、鄭氏時期台南市的關帝廟

永曆十六年（1662年），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後，以熱蘭遮城為王城，為紀念鄭氏泉州安平故里，於是改稱為安平鎮。另將普羅文遮城改為東都承天府府治所在地，承天府下設天興、萬年二縣。永曆十八年（1664），鄭經改東都為東寧，分承天府為四坊：東安、西定、寧南、鎮北；天興和萬年廢縣改州，制鄙二十四里。<sup>51</sup>

台南市一地涵蓋當時的王城及承天府府治所在，尚包含有天興州、萬年州的部分轄域。儘管設了天興州、萬年州管轄範圍名義上遍及全島，然鄭氏官民墾殖的主要區域仍侷限於今日台南、高雄一帶，而行政中心也在今台南市中區。

鄭氏政權以台灣為抗清基地，不僅帶來為數可觀的軍隊，也致力於招來人口開墾。據估算，鄭氏時代台灣的漢人人口約十二萬（或認為十五萬到二十萬之間）。<sup>52</sup>隨著漢移民來台愈多，寺廟亦陸陸續續建立。整個鄭氏治台階段，臺灣民俗宗教發展的基礎也開始奠定。

<sup>50</sup> 蔡文彩編纂，《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聚落篇（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87年），頁382~384。

<sup>51</sup> 這二十四里分別是：仁和里、永寧里、新昌里、武定里、永康里、永定里（以上主要涵蓋範圍在今台南市）、文賢里、長治里、維新里、嘉祥里、仁壽里（以上主要涵蓋範圍在今高雄縣）、仁德里、依仁里、崇德里、廣儲里、保大里、新豐里、歸仁里、長興里、永豐里、新化里、善化里、開化里、感化里（以上涵蓋範圍在今台南縣），是當時漢人移民的中心場所。參見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史》，頁155~157。

<sup>52</sup>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1991年第四次印行），頁277。

移民來台要渡過黑水溝，路途漂遙、生死未卜，為尋求神明的庇祐，往往從原鄉攜帶香火或神像來台。台灣移民來自閩地的比例最高，根據一則傳說，有關聖帝君信徒在出發前順道到關帝廟求香火，途中遇狂風巨浪，當情況危急時關聖帝君顯聖救難，讓所有人平安抵達府城的安平港，為感謝神恩，眾人集資演戲49天。<sup>53</sup>這一則的關帝顯聖傳說反映出，早期來台的移民是將關聖帝君當成守護神帶入移居地。

鄭氏政權在台灣實行的制度，大致上都是遵照明朝規章，關聖帝君在明朝已列入祀典，且受官方重視。鄭經在台灣局面穩定後，當然也建武廟、倡武德，以明恥教戰，免習於安樂。<sup>54</sup>雖然最早興建的廟宇規模並不大，但對其尊崇的態度，可說是僅次於明朝的輔國守護神玄天上帝。而軍人一向將關帝視為守護神，故來臺官兵或一般民眾，為滿足信仰需要也開始建關帝廟。在民間與官方普遍崇祀的風氣下，據清康熙年間所修較早的府縣志，如《台灣府志》、《台灣縣志》、《鳳山縣志》等資料來看，早在鄭氏治台時，關帝廟的興建已相當普及。

表 3-13 清代初期志書所載之關帝廟一覽表

志書	記載之廟數	記載之分布位置
《臺灣府志》(高志)	5	1. 府治鎮北坊 2 座 2. 鳳山縣 2 座：一在安平鎮、另一在土壠埕保 3. 諸羅縣 1 座：善化里目嘉溜灣

<sup>53</sup> 林國平，〈閩台信仰源流〉（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81。

<sup>54</sup> 孫全文主持，〈祀典武廟研究與修復計畫〉（台南：台南市政府，1987年），頁5。

《臺灣縣志》	6	1. 西定坊 2 座 <sup>55</sup> ：大、小關帝廟 2. 永康里 2 座：許厝甲、保舍甲 3. 長興里 1 座 4. 新豐里 1 座
《鳳山縣志》	2	一在安平鎮、一在土壠埕保

資料來源：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219~221、陳文達《臺灣縣志》，頁 208~214、陳文達《鳳山縣志》，頁 161。

說明：本表所整理之關帝廟，僅限建於鄭氏時期者。

從以上清代所修纂的相關府志內容來分析，鄭氏時期在其轄區的範圍內，所有的官方、民間興建之關帝廟宇至少應有以下幾座：

①在鎮北坊（西定坊），大關帝廟

②在西定坊港口，俗呼小關帝廟

③在土壠埕保

④在安平鎮

⑤在永康里許厝甲

⑥在永康里保舍甲

⑦在新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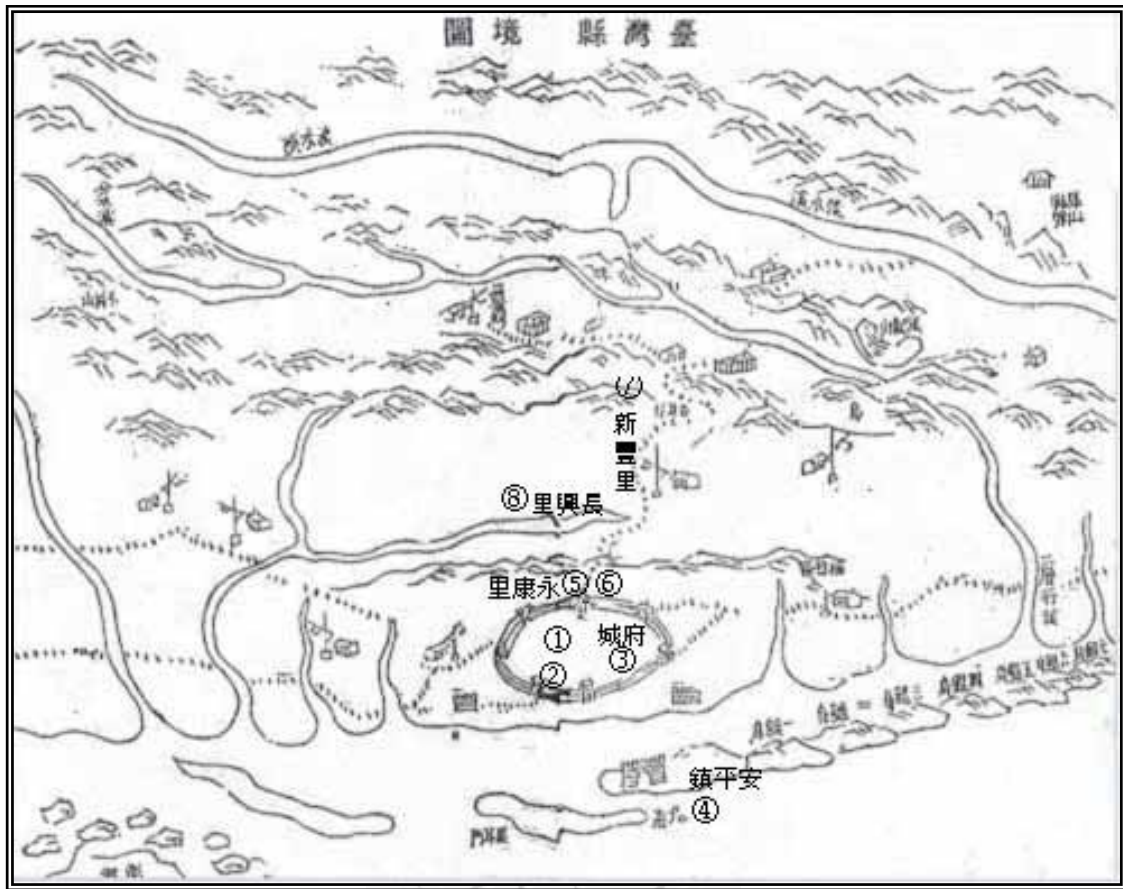
⑧在長興里

⑨在善化里目加溜灣

<sup>55</sup> 在此西定坊的關帝廟即為高志所記載的鎮北坊的關帝廟，據李冕世在〈從台南府城的武廟說到國人對關公的崇拜〉一文中的說明為：「這座武（關）廟，確在西定坊，有以後各種修碑記可憑，高志云在鎮北坊，可能是最初的區劃，但以高志誤記或誤刻的可能性最大」，但後來的志書中也有紀錄為鎮北坊的，故目前的說法有此二分法。



圖 3-1 鄭氏時期臺灣關帝廟分布圖



資料來源：自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乾隆 11 年臺灣縣境圖重繪。

說明：善化里目加溜灣關帝廟，屬於諸羅縣轄區，故未於此圖標示。

以當時的行政規劃看，這九座關帝廟位於赤崁承天府府治的轄區內的即有三座：鎮北坊大關帝廟、西定坊小關帝廟及土墾埕保關帝廟。<sup>56</sup>另外安平鎮的關帝廟，為王城所在區，接近當時安平舊聚落最熱鬧的地方石門樓的附近。<sup>57</sup>所以，鄭氏時期的政經中心即分布有四座的關帝廟，顯示官民對關帝信仰是相當尊崇。

<sup>56</sup> 土墾埕保的位置約在今天台南市府前路以南、西門路以東之地，為明鄭時期承天府的最南點。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事件時，施世驍率領的清軍曾和朱一貴在此大戰。關於土墾埕保關帝廟的資料幾乎沒有，但據《台灣地名辭書》一書中有關古地名記載的部分，筆者發現在土墾埕保附近有一馬兵營，據稱為明鄭時期的提督馬信駐守馬兵之地，因二者的地理位置相當接近，所以明鄭時期即存在的這座關帝廟，即有可能為當時屯駐的軍人所建。

<sup>57</sup> 石門樓為荷據時期的建築，當地人慣以「前有石門樓，後有五間店」來形容安平舊街的盛況。王世慶編纂《台灣地名辭書》卷 21 台南市（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年），頁 67。

另外，石萬壽在〈台南市寺廟的建置〉一文的資料中，曾進一步調查了鄭氏時期的承天府及安平地區，所有廟宇名稱及座落位置：

在鄭氏王府所在之安平地區，有熱蘭遮城東麓渡口之天后宮、東南麓的慈濟宮、東北麓的金龍殿、關帝廟、西麓的弘濟宮五處。在南區四鯤身有龍山寺。在市區的赤崁有東麓的開基靈佑宮、東南麓的萬福庵、南麓的祀典武廟；西麓自北以南有開基天后宮、竹林寺、普濟殿、廣安宮、開基關帝廟七處；西南麓有開山宮、南巷土地公廟、沙陶宮、總趕宮四處。土墾埕有關帝廟、昆沙宮等二處。鷺嶺上有北極殿，北麓蕃薯崎上的小南天、東麓有重慶寺、西南麓的五帝廟、南麓的孔子廟五處。山仔尾東麓有開山王廟、馬王廟二處。山川台北麓有府城隍廟、東嶽殿二處。北區尖山上有山上的玉皇太子宮、南麓的大觀音亭、興濟宮、西麓的三老爺宮四處。東區有桂子山東麓的準提庵、嵌頂山的彌陀寺、竹篙厝的北極殿、後甲的關帝廳四處，共有三十七處。<sup>58</sup>

據石氏的分析，這些鄭氏時期所建置的寺廟約可分為二種類型：一為鄭氏政權及官員所建，另一為民間自然形成的。關聖帝君既為明朝的祀典，上文中所述及的關帝廟為前一類型比例可能頗高。但不論其是否多為官方所建，在鄭氏統治短短的二十餘年之間，其統治中心所增建三十七座的寺廟中，關帝廟即有五處，<sup>59</sup>也可見鄭氏政權對關帝信仰之虔誠。

以今日的地理位置論，當時位於赤崁的祀典武廟與開基武廟均在今台南市中區；土墾埕關帝廟的位置也大約在中區；熱蘭遮城東北麓的關帝廟即府志中所載安平鎮關帝廟，應屬於安平區；另後甲虎尾寮的關帝廳，其實為陳文達《臺灣縣志》書中所記載之“關帝廟 一在許厝甲。一在保舍甲。俱偽時建”<sup>60</sup>兩座廟宇的結合，位於東區，也就是今日的關帝殿。據《臺南關帝殿》廟志所載，其沿革志

<sup>58</sup> 石萬壽，〈台南市寺廟的建置〉（《台南文化》新 11 期，1981 年），頁 45~46。

<sup>59</sup> 熱蘭遮城東北麓關帝廟、赤崁南麓祀典武廟、赤崁西麓開基關帝廟、土墾埕關帝廟及後甲的關帝廳。

<sup>60</sup> 陳文達，《臺灣縣志》（台北：臺銀文叢第 103 種，1961 年），頁 212。

中有這樣的一段說明：

“…入清之後，再設糖廊於柴頭港畔，稱「太爺廊」；搭禾寮於虎山之末，號「虎尾寮」；分本莊為前甲、後甲、關帝廳三莊。由是東郊草寮已成大社，保舍一甲頓成五莊，人煙日密、香火日盛；神威遠播，讚辭不絕…咸豐丙辰…護法日眾，蔭庥日廣，乃東北併許厝甲於爐下，轄境廣及太子廟庄邊…是郡治東郊之大廟，亦崁頂山上之樞紐也。”<sup>61</sup>

因入清移民不斷的湧進，使得保舍一甲地區人口大增，當地原建的關帝廟宇香火鼎盛，後來乾脆又將附近許厝甲的香火合併共祀，成為郡治東郊的大廟。所以，原來在清代志書中所記載的這二座關帝廟，後來合併為一地方大廟，即是今日的台南市關帝殿。

從這些關帝廟的設置與分布，可以推論鄭氏時期的關帝信仰發展，有以下幾點特徵。一、就空間分布論，關帝廟大多坐落在當時的政治經濟中心，如承天府府治及最熱鬧繁榮的安平港區。顯示官方與民間對關帝都是相當崇拜。二、就關帝廟佔當時總寺廟數的比例頗高來看，顯示出關帝信仰從鄭氏時期開始進入台地且發展快速，故此階段可視為台南市關帝信仰的奠基期。

不過隨著時代的發展，這些關帝廟在後來也有不同的命運。其中位於土壠埋保的關帝廟約在雍正年間被裁併，<sup>62</sup>因此後來乾隆年間成書的府志、縣志中的相關紀錄多為：「關帝廟…一在土壠埋保，今圮」。而位於安平鎮的關帝廟，則因安平港的淤塞日趨嚴重，至清代已經失去台江對外航道的機能，商業機能衰退僅餘軍事機能，在當地無多餘財力支援寺廟經濟，導致廟宇乏人維護、年久失修下而逐漸沒落。<sup>63</sup>雖然嘉慶十二年（1807）謝金鑾所修的《續修台灣縣志》中仍可見

<sup>61</sup> 《臺南關帝殿》（台南：關帝殿管理委員會編印，2004年），頁1~6。

<sup>62</sup> 土壠埋原屬於鳳山縣治的範圍，雍正元年，台灣縣知縣周鍾瑄以木柵建府城時，也把鳳山縣的土壠埋圍入城內，使鳳山縣對土壠埋的統治權名存實亡，雍正十二年，台灣縣、鳳山縣的縣界改變，土壠埋及安平等地正式由台灣縣督轄，但土壠埋的官廟關帝廟，因長期無法管理而日趨破陋，終致傾圮了。石萬壽，〈台南市寺廟的建置〉（《台南文化》新11期，1981年），頁55。

<sup>63</sup> 關於安平鎮的關帝廟，今日所能看到的資料並不多，根據日治階段初期調查安平地區所有官

到記載，但據台灣文獻會編印的《台灣地名辭書》〈卷 21 台南市〉的相關紀錄看，該廟宇約在光緒年間因傾頽被廢，神尊後來被移祀於今三靈殿。<sup>64</sup>

從民國六十八年（1979）台南市政府編印的《台南市志》〈卷二 人民志宗教禮俗篇〉、民國八十四年（1995）省政府民政廳所編《台灣省各縣市寺廟名冊》及相關的田野資料來看，今日的台南市，建廟於鄭氏時期的關帝廟，僅剩三座。但是，這三座廟宇同時也是今日台南地區香火最興旺的關帝廟，尤其每年關聖帝君的三大重要祭祀日期，均可見到信徒從各地帶著鮮花敬果前來朝拜。歷經久遠年代和不同政權的更迭變化，這些廟宇仍能以另一種新貌維持鼎盛的香火，撫慰廣大的信眾。

表 3-14 尚存於今台南市之鄭氏時期所修關帝廟

舊名	舊址	現名	現址
大關帝廟	鎮北坊	祀典武廟	永福路二段 229 號
小關帝廟	西定坊港口	開基武廟	新美街 114 號
關帝廟	保舍甲	關帝殿	中華東路二段 96 巷 1 弄 1 號

資料來源：筆者田野調查。

## 二、清領時代台南市的關帝廟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打敗鄭克塽；隔年，台灣正式納入清朝版圖，隸屬於福建省，設一府三縣。改承天府為臺灣府，三縣即臺灣縣、諸羅縣和鳳山縣，今台南市則涵蓋了當時的臺灣府府治所在和臺灣縣、鳳山縣的部分地域。光緒十一年（1885），臺灣正式設省，全省劃分為三府一直隸州十一縣廳，台南市

有房屋的資料中，記載其是屬於官置的廟宇。參見林逸人，〈安平古蹟抄記〉（《台南文化》新 2 期，1976 年），頁 54。

<sup>64</sup> 王世慶編，《台灣地名辭書》卷 21 台南市（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年），頁 70。

為台南府治所在，臺灣縣也改為安平縣，所轄範圍較統治初期已大為縮減。清代基本上仿鄭氏統治時的制度，在台灣府城內仍設「東安、西定、寧南、鎮北」四坊，並大肆擴興街肆。<sup>65</sup>

比起前朝，清代對關帝的崇祀達到前所未有的境界，所以在中央朝廷的尊崇關帝政策下，鄭氏時期所興建的關帝廟，除已傾頹者外，均得到保存，或由官方管理，或交由民間管理。府城地區的地方首長或官員們對關帝的崇祀，除了主持循例必須舉行的武廟祭典以外，對轄治內屬於官祀和官兵私建之關帝廟的維持與修建也非常重視。康熙三十四年（1695），高拱乾修纂的《台灣府志》〈卷九 外志〉寺觀（附宮廟）條記載大關帝廟第一次重建的情形，即由臺廈道巡道王效宗負責。

關帝廟 一在府治鎮北坊。康熙二十九年，臺廈道王效宗重建。因舊址而增擴之，棟宇加麗；後構禪寺，以住僧焉。<sup>66</sup>

此後府城相關關帝廟宇的新建與重修，也都可以看到官員的參與，如乾隆十七年（1752）王必昌的《重修台灣縣志》〈卷六 祠宇志〉關帝廟條，紀錄了康熙年間新建關帝廟的過程即是一例：

“關帝廟，一在道署左（寧南坊），康熙間，道標營眾建；雍正三年，巡道吳昌祚修，並撥鳳山縣大港社田租粟六十石，以供香燈；乾隆十七年，巡道金溶鼎新改建。”<sup>67</sup>

嘉慶十二年（1807）謝金鑾的《續修台灣縣志》〈卷二 政志〉壇廟條的資料中，更詳細敘述大關帝廟之後的幾次修建，幾乎都是由巡道、知府等官員所負責，

<sup>65</sup> 王世慶編，《台灣地名辭書》卷 21 台南市（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年），頁 17~20。

<sup>66</sup> 高拱乾，《台灣府志》（台北：臺銀文叢第 65 種，1960 年），頁 219。

<sup>67</sup> 王必昌，《重修台灣縣志》（台北：臺銀文叢第 113 種，1961 年），頁 169。

另外乾隆年間多了一座位於法華寺左側的關帝廟，也是由知府楊廷理所興建的：

關帝廟，其一在法華寺左，乾隆五十七年，郡守楊廷理新建<sup>68</sup>

爲了能更清楚看出清代府城地區官方對關帝信仰的重視，在此筆者將當時府城官員修建關帝廟的概況整理出一表如下：

表 3-15 清代官員興修府城關帝廟的概況表

寺廟名	創建與重修時間	修建者
鎮北坊（大關帝廟）	康熙 29 年	臺廈道王效宗
	康熙 53 年	巡道陳瓚
	乾隆 3 年	巡道尹士俚
	乾隆 31 年	巡道蔣允焄
	乾隆 42 年	知府蔣元樞
	乾隆 54 年	知府楊廷理
	嘉慶 12 年	知縣薛志亮
道署左的關帝廟	康熙年間	道標營眾
	雍正 3 年	巡道吳昌祚
	乾隆 17 年	巡道金溶
法華寺左的關帝廟	乾隆 57 年	郡守楊廷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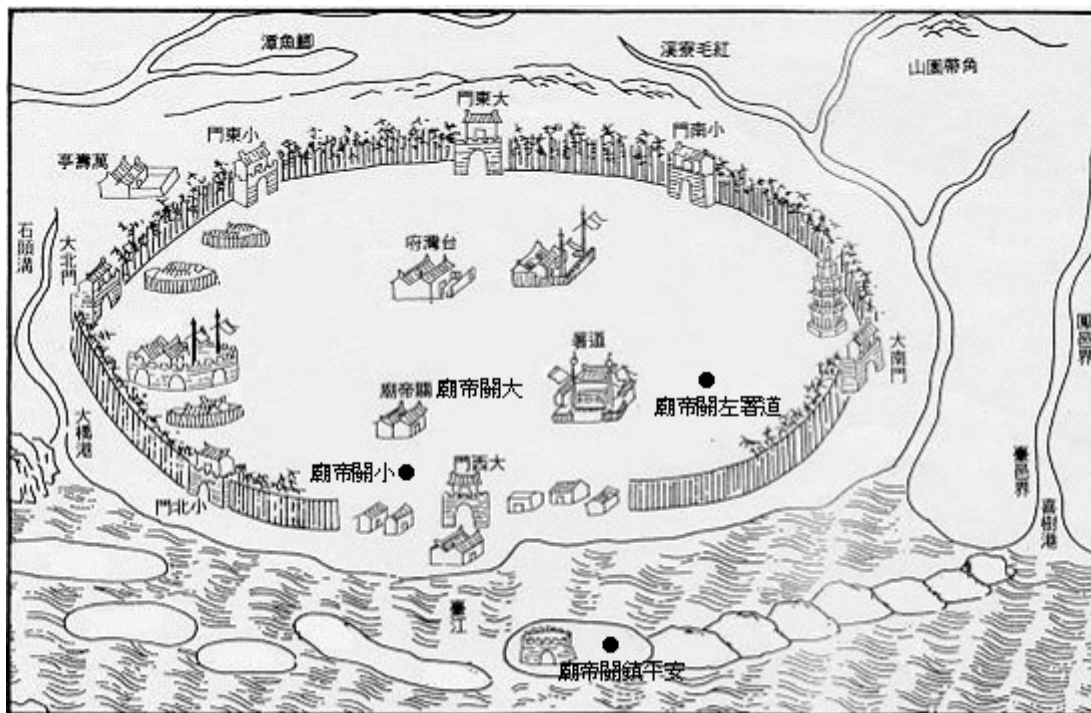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謝金鑾《續修台灣縣志》，臺銀文叢本第 140 種，頁 63。

從上面的資料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清代台灣府官方對關帝信仰發展的一些脈絡：一、在府城所有的多座關帝廟之中，位於鎮北坊的大關帝廟（今日的祀

<sup>68</sup>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台北：臺銀文叢第 140 種，1962 年），頁 63。

典武廟)在此時即已取得超越其他關帝廟的地位，成為府城官祀的武廟。從康熙到乾隆甚至嘉慶年間，歷朝對其都不斷有重修、改建、增建的做法，並且由官方定時舉行祀典，為當時台灣地區地位最高的關帝廟。二、修建關帝廟的原因有部分是為向民眾宣示關帝顯聖護衛皇權而進行的。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知府楊廷理重修大關帝廟時留有一「重修郡西關帝廟碑記」，碑記中提及為完其頽缺，象設維新，目的即為報答關帝助官方平林爽文之亂的神功。<sup>69</sup>三、道署左側的關帝廟，為官兵私下供奉，並非一般民眾崇拜對象，故亦由地方首長修建。

圖 3-2 清領初期府城關帝廟分布圖



資料來源：自范咸，《重修臺灣府志》乾隆 11 年台南府城圖重繪。

在民間發展方面，清廷統有台灣之初，雖有渡台禁令的頒布，使來台移民受到限制。不過海禁的開放，清廷指定安平為台海兩岸對渡的港口，大陸來台貿易

<sup>69</sup> 謝金鑾纂，《續修台灣縣志》(台北：臺銀文叢第 140 種，1962 年)，頁 514。

的商舶，開始絡繹於台江。當時台灣府治西瀕台江，故在西門外一帶，逐漸成爲萬商雲集的埠頭。雍正十年（1732）以後數度解除攜眷來台的禁令，一波波移民更大規模的湧入台灣。隨商業貿易的繁榮，府城的市街也不斷在擴充，各街廓居民在祈福避禍的心理作用下，也紛紛建廟祭祀各類神明以佑民安，因此，形成了府城街坊廟宇林立的景觀特色，當道光年間民亂侵逼時，廟宇甚至組成聯防組織單位，負起保衛鄉里的責任。<sup>70</sup>

早期府城的海岸綫大約以今日的西門路爲界，隨著泥沙淤積，海岸綫逐漸外移，爲了接駁貨物上岸於是開闢了五條港區以爲因應。在港區工作的碼頭工人們向來也透過建立廟宇，供奉家鄉的神祇，以作爲守護及凝聚群體的信仰中心。道光十年（1830），在五條港正中的南勢港北岸，許姓的碼頭工人創建了一座廟宇「金華府」，奉祀關帝。這是清朝統治台灣二百多年來，在府城所興建的第一座民間私祀關帝的廟宇。

官方所修纂的志書上，並未見到有關金華府的紀錄。一方面是因爲謝金鑾的《續修台灣縣志》成書於嘉慶十二年（1807），比建廟時代早；道光十年（1830）的《台灣采訪冊》雖有關於台灣府城市街等的內容，不過並無寺廟的相關記載。另方面志書所蒐錄的多是比較有規模的，或較具代表性的廟宇，金華府的前身只是許姓人從唐山請來關帝當守護神，並向三郊先購一倉庫將關帝爺供奉其內，等到經濟上有餘力後才將此倉庫改建成爲廟宇的。

臺灣入清之後，官兵和民眾爲了滿足關帝崇拜之需要，臺灣府城內外續有關帝廟增建。首先大約於康熙中期，府城道標營眾於道署左側新建關帝廟一座，作爲官兵崇拜之所。其後，乾隆五十七年（1792），林爽文之役後爲獎功恤烈，知府楊廷理祀關帝於法華寺左。到道光十年（1830），才又出現第三座關帝廟金華府，此乃民間自原鄉請來神像建廟奉祀的。

---

<sup>70</sup> 清中葉以後，府城街坊間的寺廟，爲維持地方上的治安，乃依彼此地理位置的遠近，成立十個聯境組織，以達到鄉里間守望相助的功能。邱麗娟撰，《續修台南市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台南：台南市政府，1996年），頁5。



雖然清代在府城地區所增建的關帝廟宇數目並不多，和其他神祇信仰如天上聖母媽祖、或代天巡狩王爺的蓬勃發展有所差異。不過加上鄭氏時期所興建，後來在政治考量下仍被保留之關帝廟，在裁併、整修、重建後，當時的府城仍有七座關帝廟被官方及民眾所崇祀著。

大關帝廟 鎮北坊（今祀典武廟）

小關帝廟 西定坊港口（今開基武廟）

關帝廟 安平鎮（光緒年間圯）

關帝廟 保舍甲、許厝甲（今關帝殿）

關帝廟 道署左（今關帝廳）

關帝廟 法華寺左（今法華寺內）

金華府 南勢港（今金華府）

清代整個府城內的街廓發展以鎮北、寧南、東安、西定四街坊為主，尤其是十字大街兩側及西定坊的港區最為繁榮。城外則以鄭氏時期早已發展的安平地區和因臺江東岸的海岸線西移擴展出的新生地五條港區為主。<sup>71</sup>從這些關帝廟的分布位置看，位於府城內的關帝廟都與官方關係密切。由官方所修建，或撥田租供香火的大關帝廟、道署左關帝廟及法華寺左關帝廟皆是。而位於港區附近的則為民眾所奉祀或修建，如開基武廟及金華府。顯示出因奉祀對象的不同，而影響關帝廟地域性分布的差異。

至於這幾座關帝廟後來的發展，除了前述已討論過的部分外，新增附設於道署左的關帝廟，在日治時期因道路拓寬而被迫遷建，不過仍位於今台南市的中區。另外乾隆五十七年（1792），郡守楊廷理所倡建位於法華寺左側的關帝廟，今日的實況演變為關帝殿成為整個法華寺建築的一部分，關帝也成為所配祀的神明之一。<sup>72</sup>所以一般寺廟調查中以寺廟主神為分類的狀況下，往往不將這座關帝

<sup>71</sup> 王世慶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 21 台南市（南投：臺灣文獻委員會，1999 年），頁 14~20。

<sup>72</sup> 法華寺的前身為明鄭時代的寓賢李茂春故居，原名「夢蝶園」。康熙二十三年入清後，改建

廟列入。至於金華府則座落於今台南市西區，清代中期府城的廟宇建立起聯境組織來維護地方治安，金華府為當時三協境的成員之一。<sup>73</sup>

從清代關帝廟發展的情形論，初期官方大力提倡關帝信仰，故官員們對關帝廟的修建與維持，均相當注意。從志書中可以看到至嘉慶朝初年為止，修建大關帝廟及倡建新關帝廟，都由行政首長所負責。而民間增建或修建關帝廟則從清代中葉以後才開始，這主要與當時府城商業繁榮、民間經濟力大為提升，頗有關係。另外，關帝廟的地域性分布與崇奉的對象有重要相關。清代官方增建的寺廟，都在城內的官署附近，屬於政治中心。民間所建的寺廟則位於繁榮的港區，為府城的經濟中心所在。從分佈的差異其實也可反映出，官方崇奉關帝是以政治教化為主要考量，民間祭祀關帝則為祈求平安及商業順利。

總結上述鄭清時期所有的資料來看，可以得到以下幾個結論：其一，關聖帝君的祭祀屬國家祀典，受到官方高度的重視，故主要廟宇的維護、重建均由官府來主導。從府志中所留下相關的記載，可以約略看出，官方如此做法其實是基於二個考量。一是為了便於統治台地的人民發揮教化的功能，使得部份台地陋習能夠得到改進。另一為對付民變的一再發生，更希望能透過關帝的神威顯聖護國，傳遞百姓當盡力發揚效忠皇權的精神。所以藉著定期的祭祀、不斷的增建擴張廟宇規模、立修建碑文等，來時時刻刻提醒。其二，官方政治力的消退並不影響關帝的地位。嘉慶朝以後，民間在移民日眾、商業大盛的情形下，開始大肆建廟。且隨統治力量的衰退，有些原本具有官方性質的廟宇在民間也能新建，如天公廟。這是因為時空環境的轉變，神祇所代表的意涵也會隨之轉換。原本關聖帝君所代表的強烈政治教化特性，在官方力量薄弱後逐漸消退。祂不再是個遙不可及的政教神，取而代之的是其原本就具有的各階層所奉祀的各種職能，當然在民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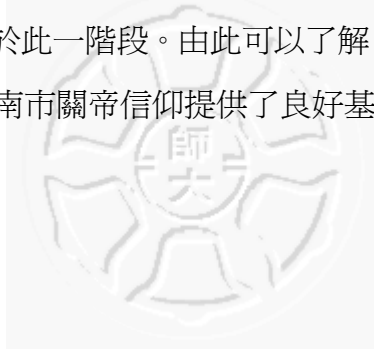
---

夢蝶園且命名法華寺，主祀釋迦佛祖，今為三級古蹟。法華寺的祭神在第一進有彌勒佛、四大天王之「天王殿」，第二進為主祀三寶佛的「大雄寶殿」，第三進是奉祀觀音菩薩的「後殿」。另有左右兩進，左前殿祀關帝，後殿祀土地公，後殿與後殿相連的過水廊有註生娘娘，右前殿祀火神爺，後殿為聚賢堂，所祭祀之神祇已具有儒、釋、道混合的狀況。

<sup>73</sup> 三協境的境主廟為風神廟，其下成員有南沙宮、金華府、藥王廟三廟，負責防禦南勢港、南河港。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台南市五條港歷史區域神農街金華府調查修護暨五條港生活文化會館再利用計畫》，頁 25。

就能繼續維持其地位。其三，清代中期以後民間才開始興建關帝廟。清初來臺移民也多有攜帶關帝香火，只是府城的關廟數目頗多故暫時無建廟的需求，所以道光年間，五條港區許姓碼頭工人創建的金華府主祀關帝，為清代府城地區第一座由民間興建的關帝廟。其四，從這些關帝廟的分佈位置看，與府城的地理環境演變及開發方向呈現一致性。鄭氏時期關帝廟的位置均在今台南市的核心區（中區），清代關帝廟開始轉向新開發區設置。最後，隨著時代的發展及都市的更新計畫實施，有些早期興建的廟宇早已傾圮不存，或有的廟宇已被廢棄，神明寄居於他處成為配祀神，不少鄭清階段修建之關帝廟到今日並未完全能得到保存。

從現今各寺廟調查的資料中，將台南市所有的關帝廟宇數目與建廟年代做一分析來看，<sup>74</sup>鄭清時期所建之關帝廟還佔有將近一半的比例。且今日香火較盛的關帝廟，如祀典武廟、開基武廟及關帝殿等，在傳統俗民信仰生活中，仍有一定的香火與地位的，都是建於此一階段。由此可以了解，鄭清時期所開始、發展的關帝崇祀概念，為今日台南市關帝信仰提供了良好基礎。



---

<sup>74</sup> 據內政部民國九十年《全國寺廟名冊》中的記載，台南市的主祀神為關聖帝君或文衡聖帝者有 14 座，但據筆者實際田野調查的結果，有一雖登記主祀神為文衡聖帝，但實際上奉祀者為玄天上帝，故以此文獻實際奉祀關帝的總數應是 13 座。

### 第三節 日治與戰後台南市的關帝信仰

光緒二十一年（1895）七月，日本接收台灣後，隨即改清代原有的台南府安平縣為台南縣安平支廳，縣治、縣署均設在府城，當時全台灣共有三縣一廳。<sup>75</sup>後來陸續經過幾次行政區劃調整後，大正九年（1920）日本政府又劃分全台為五州、兩廳、三市、四十七郡、一百五十五街庄，而台南市街乃升格為台南市，屬於台南州管轄，為州治所在，這也是「台南市」地位確立的真正開始。<sup>76</sup>戰後，政府就日治時期的編制，改設縣、省轄市，而台南市正式成為省轄市至今。

#### 一、日治時期台南市的關帝廟

日據初期兵荒馬亂，隨著台人抗日活動的進行，日本軍隊南征北討，絕大部分寺廟多被軍隊佔用，對於神佛像與佛具，更是無所顧忌的予以破壞，為了防止台灣民眾反感對日本政府產生壞印象，於是在明治二十九年（1896）八月由首任總督樺山資紀發表了本省宮廟寺院有關保存的諭告：

本島在來之廟宮寺院等，在其創建雖有公私之區別，總之是信仰尊崇的結果，又是德義之標準，秩序之淵源，治民保安上不可或缺者也。故目前軍務控總之際，出其不得已雖有一時暫為軍用，切勿損傷舊觀，需要特別注意，舊中如破壞神像，散亂神器等所為，苟且斷不許之。自今以後須小心注意保存，如有暫供軍用者，須火速回復舊態，此旨特為諭告。<sup>77</sup>

其後，數任總督所實行的政策也大都採安撫、放任的態度，雖然也開始對台人的寺廟進行調查，不過基本上仍能尊重台灣的風俗習慣及寺廟信仰。對於清代

<sup>75</sup> 王世慶編纂，《台灣省地名辭書》卷21 台南市（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年），頁2。

<sup>76</sup> 瞿海源編纂，《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頁997。

<sup>77</sup> 莊芳榮，《台灣地區寺廟發展之研究》（台北：學生書局，1995年），頁101。

的官廟，日人則採取了較積極的處理方式。凡代表清朝權力或官署附屬之寺廟，幾乎全遭廢除，如社稷壇、萬壽宮<sup>78</sup>等。另屬於文教機構所附廟堂倖存者亦不多，至於清代官吏之專祠，除少數由後代或居民維持外，大部分亦因無人維持而自行撤銷，僅有官建而官民一起奉祀的寺廟，得以倖存。<sup>79</sup>若以石萬壽在〈台南市宗教志〉一文的統計資料來看，日據時期台南市所被廢墮的寺廟多至有八十四所。其中象徵清代皇室權威被廢者有九間，如山川壇、社稷廟；衙門所屬寺廟有十一間被廢，如道天后宮、府文廟土地；而清代官吏的專祠被廢者也有九間之多，如高公祠（諱拱乾）、蔣公祠（諱毓英）。<sup>80</sup>

台南市的關帝廟原分屬於官方和民間所有，在面臨統治權力更換之際，也難免有一番曲折：一、日本政府原本規定，凡清朝官署所附屬的寺廟都要廢除，而道署附屬的關帝廳本為清廷官兵私下奉祀關帝之所，因另有信徒，故交由民間管理。二、大關帝廟（武廟）雖為官建，但從清代中期以後為官民所共同崇拜，也改交由民間管理。三、小關帝廟及後甲虎尾寮的關帝廳，早在清代即由地方郊商及民間所維護故不受影響。至於金華府，本為民間所建及奉祀，日人並無干涉。

因此據昭和八年（1933）相良吉哉所編纂的《臺南州祠廟名鑑》<sup>81</sup>的記載，當時台南市有六座的關帝廟：

表 3-16 昭和八年（1933）台南市的關帝廟調查表

廟名	主祀神	教別	所在地	信徒
關帝廳	文衡聖帝	儒教	末廣町二丁目	50 人
開基武廟	關帝爺	儒教	本町四丁目	62 人

<sup>78</sup> 萬壽宮，俗稱皇帝殿，奉清朝諸皇帝牌位，供官民朝拜行禮用。日治初期被改充為台南地方法院及其宿舍。王世慶編纂，《台灣省地名辭書》卷 21 台南市（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年），頁 179。

<sup>79</sup> 石萬壽，〈台南市寺廟的建置—台南市寺廟研究之一〉，《台南文化》新 11 期，1981 年），頁 65~66。

<sup>80</sup> 石萬壽，〈台南市宗教誌〉（《台灣文獻》32 卷第 4 期，1981 年）頁 4~5。

<sup>81</sup> 本書有全台南州所有的廟宇及宗教團體的紀錄，主要以日治前期所調查的寺廟台帳為基礎，加以訂正後，並於昭和五年派人調查各廟管理人、信徒等變動資料整理而來。

武廟	文衡聖帝	儒教	臺町二丁目	40 人
正心社	文衡聖帝	儒教	永樂町一丁目	30 人
金華府	文衡聖帝	道教	永樂町二丁目	70 人
關帝廳	關帝爺	儒教	仁德庄虎尾寮 <sup>82</sup>	400 人

資料來源：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頁 13~44。

從此資料中筆者發現到一現象，即日人在判斷宗教的屬性時將關帝列為儒教的神祇，上述六座關帝廟中有五座都被歸入此類。據蔡相輝的看法是說當時主管宗教事務的丸井圭治郎把寺廟當成是儒家的象徵，所以只要是寺廟均將之歸屬於儒教。<sup>83</sup>另外據 1941~1945 年發行的《民俗臺灣》雜誌<sup>84</sup>中有一篇〈臺灣的儒教〉，其對儒教的解釋幾乎等同於我們今日所說的民俗宗教。<sup>85</sup>而據增田福太郎在《臺灣本島人の宗教》的說法，儒教是自唐虞三代以來，即已發展出來的自然崇拜、靈魂崇拜與聖賢偉人的祭祀等之總稱。<sup>86</sup>這裡較適合的解釋應當是增田福太郎的概念。而唯一被列為道教的金華府，可能是因為其為單一姓氏許姓所供奉，較類似家廟祭祀的性質，故被歸類為一般道教。

日人雖對寺廟採取放任不干涉的態度，但卻因實施都市計畫、建立官方機構等多項作法，使得有些寺廟遭到拆除、毀損或遷建的結果。其中以日本政府在台南所實施的「市區改正」影響最大。日治時代，台南府城歷經了多次的行政變革，由台南市街升格為台南市，並先於明治四十四年（1911）前後進行了市區改正，使台南府城的舊城景觀，產生了莫大的改變。<sup>87</sup>在市區改正的過程中，許多的廟宇或舊街道為遷就新道路通過遂被拆除，有些廟宇則被遷移位置，所以，今日想

<sup>82</sup> 本廟即為今日台南市關帝殿，在相良吉哉的調查中，因當時地理區劃為仁德庄，故並未在當時台南市資料中得見。但筆者認為應在此一併列入討論會較恰當，故將其亦列入表中參考。

<sup>83</sup> 蔡相輝、吳永猛編著，《臺灣民間信仰》（台北：空中大學，2001 年），頁 16。

<sup>84</sup> 《民俗台灣》所刊行的時間正逢日本政府在台灣推動皇民化政策，雖曾一度遭查禁停刊，但最後仍得以繼續發行。其內容主要是紀錄台灣島人的生活史，包括有民情、風俗、文學、諺語、宗教、信仰及鄉土美食、民間藥草等。

<sup>85</sup> 林川夫主編，《民俗臺灣》第七輯（台北：武陵出版，1991 年），頁 71~100。

<sup>86</sup> 增田福太郎，《臺灣本島人の宗教》（台南：臺南州衛生課發行，1937），頁 15。

<sup>87</sup> 王世慶編纂，《台灣省地名辭書》卷 21 台南市（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年），頁 23。

用舊地名來訪查位置不定，或已被遷移的廟宇很難尋得舊跡，即以此故。如在清朝備受尊榮的祀典武廟，即在台南市實施市街改正，廟東的永福路要拓寬時，馬使爺廳<sup>88</sup>遭到部份的拆除。<sup>89</sup>另外清代建省前，台灣最高的行政機構台澎兵備道（簡稱道署）附近的土地公廟，在大正十二年（1923）因開闢道路而遭拆除，福德爺因此遷入道署附近的關帝廳祭祀。昭和初年，連道署關帝廳也因位於欲拓建的中正路上而遭拆除，遷建至王提堂，<sup>90</sup>雖經居民重建移祀，規模已不如前。

昭和十二年（1937），盧溝橋事變發生，台灣總督府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而寺廟整理亦為其中要項之一，這使得台灣的宗教信仰和寺廟遭受到空前的浩劫。部分地區廟宇開始受到整頓，各種神像包含福德正神、關聖帝君、開漳聖王、天上聖母、玉皇大帝和保生大帝等，泥塗之塑像用斧推毀，木雕者除部份送政府研究單位典藏外，大部分予以燒毀，寺廟則予以拆掉。當時臺南州受到的衝擊相當大，據相關紀錄顯示，寺廟被廢毀者有 194 座、移作他用有 419 座、神像被燒毀有 9749 尊、沒收則有 1628 尊，為全臺數量最多的。<sup>91</sup>其中，關帝廟被廢毀的也不少，共有 35 座之多，<sup>92</sup>以全臺南州所廢毀的寺廟總數來看，佔高達 18% 的比例。這對當時關帝信仰的發展，無異為一重大的挑戰。

刊行於 1941~1945 年的《民俗台灣》曾有部分台南地區寺廟的相關紀錄。其中在昭和十七年（1942）九月號，由臺南市視學西田豐明所寫的一篇文章〈台南市の寺廟現況〉，為同年三月全台南市寺廟調查的結果。當時全市仍有的廟宇總數共有 118 座，其中屬於關帝信仰的部分，據筆者整理的結果，主祀神為關帝或有相關的共有 6 座，列表如下：

---

<sup>88</sup> 馬使爺廳，奉祀武聖關公的座騎赤兔馬及照顧此馬的馬伕，屬祀典武廟的一部份。

<sup>89</sup> 〈祀典武廟〉簡介（台南：台灣祀典武廟管理委員會），頁 5。

<sup>90</sup> 王提堂係指今日永福路二段 54 巷一帶，即今日關帝廳廟址所在。

<sup>91</sup> 蔡相輝，〈近代化與臺灣的民間信仰〉（《臺灣文獻》51 卷第 2 期，2000 年），頁 239。

<sup>92</sup> 蔡相輝，〈台灣的關帝信仰及其教化功能〉（盧曉衡主編《關羽、關公和關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頁 175。

表 3-17 昭和十七年（1942）台南市主祀神為關帝的廟宇

廟名	主神	所在地	現況
關帝廳	關帝爺	末廣町一丁目	倉庫，參拜者無
法華寺	釋迦佛、關帝爺、火德星君	昭和區桶盤淺	原貌，參拜者少數
馬使爺廳	關羽的馬夫、愛馬	本町三丁目	倉庫，參拜者無
關帝廟	文衡聖帝	本町三丁目	指物工場，參拜者少數
開基武廟	關帝爺	本町四丁目	原貌，參拜者少數
金華府	關帝爺	永樂町二丁目	倉庫，參拜者無

資料來源：西田豐明〈台南市の寺廟現況〉，頁 32~44。

從上表中可以清楚看到台南市的關帝廟，在歷經推行市區改正及寺廟整理政策後的情況。與前述昭和八年（1933）相良吉哉的資料比較之下，除了位於仁德虎尾寮的關帝廟因不屬台南市的範圍以及正心社因屬神明會性質未被列入外，其紀錄有案的關帝廟均趨於沒落。前來參拜之信徒稀少甚至沒有，關帝廳、馬使爺廳更因廟宇被拆除，神像只得移置於倉庫中，能勉強維持原貌者只有開基武廟及法華寺而已。

日人雖然毀棄不少原來的祠祀，但在日治階段也增建了若干廟宇：一、在台南風化雪月區普濟殿一帶（五條港區），因高雄港的興起往昔繁華逐漸消失，遂有奉商業之神關帝爺團體的正心社的出現，希望藉關帝的保佑，恢復以往的繁榮。<sup>93</sup>據相良吉哉的《台南州祠廟名鑑》中記載，其最初管理人陳明濤的祖先攜帶神像渡海來台，在北勢街自宅奉祀，後來組成神明會共同奉祀關聖帝君，並在神明指示下才移祀於普濟殿附近，對當地風俗的教化有很大的助益。<sup>94</sup>二、隨台江淤塞嚴重，海岸線離市區愈遠，原本的沿海地區出現了海埔新生地，成為府城

<sup>93</sup> 石萬壽，〈台南市寺廟的建置〉（《台南文化》，新 11 期，1981 年），頁 67~68。

<sup>94</sup> 相良吉哉，〈台南州祠廟名鑑〉（台北：古亭書屋，2002 年台北初版），頁 25。



的新開墾區。墾戶們新來乍到，許多的新建寺廟也一一出現。在今南區灣裏，明治三十七年（1904）修建的省躬社，即由市區的小關帝廟（開基武廟）分香於此，並具有鸞堂勸化的性質。另外，在安南區十二佃，明治四十二年（1909）修建的南天宮，則由漚汪來的墾戶，自當地的文衡殿分香至此建廟。<sup>95</sup>

表 3-18 日治時期台南市增建的關帝廟

編號	廟名	位置
1	正心社	西區普濟殿附近
2	省躬社	南區灣裏社區
3	南天宮	安南區十二佃

資料來源：相良吉哉《台南州祠廟名鑑》，頁 25 及石萬壽〈台南寺廟的建置〉，頁 68。

整體來看，日治時期台南市關帝信仰的變化是：其一，在清代時被列為官方祀典，或由官府編列經費祭祀支應廟務開銷被取消，使官祀的關帝廟受到較大影響。所以大關帝廟在日治時期，幾次的修建均由信徒捐獻，其中甚至有一次計畫重修廟宇因與市區改正衝突而被迫終止。其二，此階段新建的關帝廟與市區的擴展關係密切。日治時期的市區改正計畫使得原有府城的城牆遭到拆除，台南市區也因此得以向外擴增範圍，進一步向南區、東區延伸。當人口逐漸向這些區域遷移，關帝廟也隨之建立。其三，此階段開始出現奉祀關恩主的儒教信仰，即今日所謂的鸞堂—省躬社。其建社的目的據稱是為移風化俗、教化人心，並希望在世道飄搖之中提倡漢人傳統的儒家倫理。其四，因政治環境變化，此時府城的關帝廟開始出現完全自台灣祖廟分香而祀的現象，有別於前清階段有不少由大陸祖廟分香而來的作法。其五，許多當時統治政策的推行，成為影響日治時期台南市

<sup>95</sup> 十二佃，乃因安定里西保漚汪莊的程、高、毛、吳、許、陳等姓共十二戶遷入墾殖而得名。此地建的南天宮亦同時奉祀池府千歲。范勝雄，〈台南市安南區之寺廟信仰初探〉（《臺灣文獻》44 卷第 2、3 期，1993 年），頁 69。

關帝廟發展的關鍵因素，如市區改正、寺廟整理等。原本的關帝廟被拆除或遷建，信徒的人數大為減少，都使在前朝倍受尊崇的部分關帝廟逐漸趨於沒落。第六，關帝的神格已開始轉變。正心社的出現，是希望能恢復當地昔日的繁華，故選擇商業之神的關羽為奉祀對象。在大陸地區，關羽原本就具有多面向的神格，不過鄭清朝廷在台灣卻只著重關帝能福國祐民，教化萬民的這一部分。隨著日本治台後，不再利用關帝信仰進行神道設教，致使前述功能漸失，連帶的也使關聖帝君的其他面向得以發展。除了作為商業之神能助人積累錢財外，關帝也開始轉化為一允文允武、具備忠孝節義的恩主公形象，以另一新的面貌繼續為人所崇拜。

## 二、戰後台南市的關帝廟

民國三十四年（1945），隨著日本無條件的投降，台灣擺脫了日治時期推行皇民化運動時的所受到的宗教信仰之限制與拘束，民間通俗信仰開始漸次恢復。寺廟之重修或新建，一如雨後春筍，蓬勃而興。1970年代以後，更由於經濟發展迅速，國民所得年年提高，社會型態也由農業轉向工業社會，使得寺廟的翻修與興建顯得更富麗堂皇，各種祭典的進行，甚至吸引廣大信眾的參與而蔚為一股全國流行的風潮，如元宵的鹽水蜂炮、農曆三月的迎媽祖等。

民國四十八年（1959），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在戰後第一次大規模調查各地寺廟教堂等資料。當時全台灣共有寺廟宗祠等約 3834 座，內含有廟宇 2949 座、佛寺 838 座及宗祠 47 座。其中關帝廟的數量恢復至 192 座，在所有神祇中排名為第六位。<sup>96</sup>根據這份資料，當時台南市的關帝廟計共有八座。

除了前已述及的關帝廟之外，這時新出現一座位於安平區的三靈殿。其實，此座廟宇原本奉祀的是福德正神，道光年間開始以馬府千歲為主神。光緒二十一年（1895），因當地的關帝廟在年久失修乏人管理的情況下廢棄，故關帝神像即被迎至此合祀。此次調查中，三靈殿的主祀神就登記為關聖帝君。

---

<sup>96</sup> 莊芳榮，《臺灣地區寺廟發展之研究》（台北：學生書局，1995年），頁 176~177。

表 3-19 民國四十八年（1959）台南市的關帝廟一覽表

地區	名稱	創建階段	地址
東區	關帝廳	鄭氏時期	裕農路 122 號
南區	省躬社	日治時期	灣裡 85 號
西區	金華府	清道光年	南勢里神農街 49 號
中區	開基武廟	鄭氏時期	武聖里西門路 10 巷 29 號
中區	祀典武廟	鄭氏時期	天后里永福路 149 號
中區	關帝廳	清康熙年	永福 2 巷 14 號
安南區	南天宮	日治時期	佃東里 12 佃 17 號
安平區	三靈殿	清嘉慶年	安中里安北路 12 號

資料來源：劉枝萬〈台灣省寺廟教堂名稱、主神、地址調查表〉，頁 85~91。

依民國四十八年（1959）的資料來看，從戰後到當時（民國四十年代），台南市的關帝廟似乎並未有任何的增建。這應該是因為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台南市飽受戰火蹂躪，損失慘重。直到戰後，信徒認為因有神明保佑而得以平安度過戰爭時期，莫不傾全力修補被破壞的寺廟，讓神有安居之所，以報答神恩，故一時尚不急於關帝廟之增建。

民國六十八年（1979），台南市政府編印的《台南市志》〈人民志宗教篇〉一書，對全台南市的廟宇及奉祀主神進行調查統計。從此書中，明顯可以看出民國四十年以後至民國六十年間，台南市的關帝廟開始有加速發展的趨勢。據這份資料，全台南市登記的道教廟宇總數共有 152 座，主祀神為關聖帝君（文衡聖帝）的廟宇則有 10 座，除了民國四十八年資料中所列者外，新增廟宇表列如下：

表 3-20 民國六十八年（1979）台南市新增關帝廟一覽表

編號	區	名稱	創建年代	地址
1	東區	南善聖堂	民國 52 年	光華街 275 巷 264 號
2	南區	南府聖賢社	民國 58 年	鹽埕 247 號
3	南區	舉善堂	民國 52 年	灣裡 805 號
4	安平區	關帝聖堂	民國 58 年	安平路 570 號

資料來源：《台南市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 84~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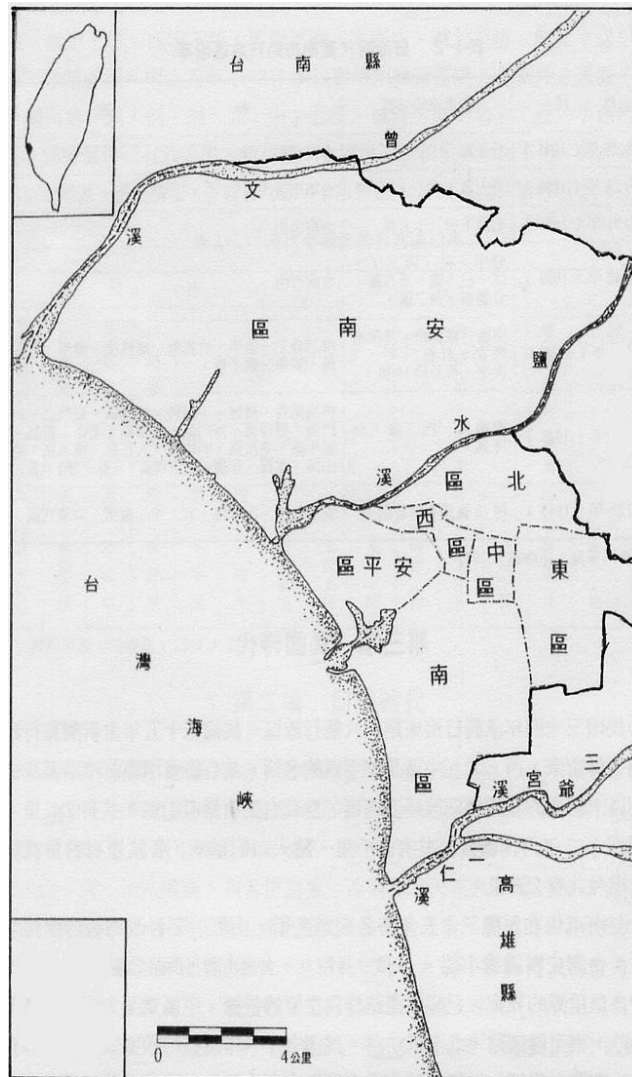
以這份資料和民國四十八年（1959）的資料相互對照下，其實有一些的出入：一、除了新增的四座廟宇：南善聖堂、南府聖賢社、舉善堂、關帝聖堂之外，另外有表列的六座關帝廟為鄭清階所建的五座關帝廟，加上日治時期灣裏地區的省躬社。至於安南區南天宮的主祀神改登記為池府千歲、安平區三靈殿的主祀神也登記為馬府大帝，故在此次的統計中即從關帝廟的部分排除。<sup>97</sup>二、部分的廟址因為台南市的行政區劃重新調整，所以有一些前後差異。三、在所有廟祀主神的統計中，關帝是繼王爺、天上聖母媽祖、保生大帝之後，與福德正神名列第四位。這和前述民國四十八年的調查統計資料相較，當時主祀關聖帝君的廟宇總數在全國排行是第六位。顯然的，這時台南市的關帝信仰又重新恢復到早期繁榮的景況。

我們可以看到，這幾座新增加的主祀關帝廟宇，皆在民國五十幾年間所建。這是因為從民國四十年以後到民國五十幾年的這段期間，戰後混亂的局勢已逐漸穩定下來，居民有餘裕開始新建廟宇。另外，此時台南市發展已久的舊市區如中、西區，早已呈現飽和的狀態，隨人口的增長，台南市的轄區更快速向外擴展。從北區、東區開始，漸漸往南區、安平區及戰後才納入台南市的安南區發展。（見

<sup>97</sup> 安平區的三靈殿從道光年間起，主祀神即為馬府千歲。民國 48 年的調查登記關聖帝君為主祀神，應該是關帝當時被一起合祀，但調查人員並未詳察之緣故。另安南區的南天宮，當時的調查即為關帝與池王爺同列主祀神。但以安南區的信仰發展來看，主要是以保生大帝及王爺信仰居多，故後來的調查便以池府千歲為主祀神。

圖 3-3) 人口也陸續移入這些地區，故上述新建關帝廟的出現即與市區的擴展有密切關係。

圖 3-3 台南市轄區圖



資料來源：《臺灣省地名辭書 卷二十一 台南市》，頁 6。

從這四座新增廟宇的地理分布位置看，都屬於台南市新開發區的範圍，可以推論，此時台南市關帝廟的建立開始從市中心向新的人口集中區擴散。另外，南區所增建的南府聖賢社與舉善堂，和日治階段興建的省躬社一樣皆屬鸞堂性質。

可知，台南市的關帝廟在歷經官祀、軍祀、民間奉祀的發展後，開始往鸞堂關恩主崇拜拓展。而這應該與當時的政治環境頗有關係。鸞堂藉扶鸞的方式代天宣化，對傳統儒家倫理的維護相當積極，這樣的信仰內涵有助於社會穩定。所以，從台南市的關帝廟發展來看，戰後至五十年代，主要多為鸞堂的建置。

民國八十五年（1996），台南市政府所編纂的《續修臺南市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以民國八十年為斷代，有更新的台南市寺廟的主神統計、分布情形。這時全市的總廟宇數（含佛、道、天主、基督、理、大同教）已增至 309 座，其中以關聖帝君為主祀神的則有 14 座，屬於新增者有 5 座：

表 3-21 民國八十年（1991）台南市新增關帝廟一覽表

編號	區	名稱	創建年代	地址
1	東區	山西武聖宮	民國 70 年代	裕農路 661 巷 25 弄 2 號
2	東區	前甲顯明殿	民國 68 年建廟	裕農路 446 巷 45-2 號
3	東區	南天府	民國 73 年建廟	裕豐街 214 巷 25 號
4	東區	武玄宮	民國 60 年代	崇明十街 70 巷 6 號
5	安南區	文武聖廟	民國 65 年	府安路五段 113 號

資料來源：《續修臺南市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 17~23。

上述資料和台南市政府在民國六十年代所編纂《臺南市志》的統計做一比較，除了廟址的部分有一些改變外，差別就在民國六十年到民國八十年的這二十年間，台南市的關帝廟又增加了五座之多。這當然是和台灣在政府陸續推動許多重大建設，使得經濟開始快速發展並轉型為以工商業為主的社會型態大有關係。生活愈富庶則廟宇的興建愈多、規模愈大，而競爭壓力的激烈也使得人們更急於從超自然的力量中得到幫助。不過，以全市所有的寺廟數目來看，關帝廟的總數

位於觀音菩薩、保生大帝、天上聖母、釋迦佛祖之後居第五位，<sup>98</sup>比起前期似乎有開始下降的趨勢。

就這幾座增建廟宇來看，首先，以地理位置論，位於東區的有四座，另外安南區有一座，顯示此一階段台南市的市區仍在外擴。雖然台南市在附近的高雄市成為南部最大都市後曾開始逐漸沒落，並有人口外流的趨勢，不過近年來，一些新建設的推動使台南市仍有部分的成長空間，尤其東區及安南區的發展快速，人口大為增加，故有新增廟宇。其次，在東區新增的廟宇中，除了武玄宮外的其餘二座廟宇：山西武聖宮及前甲顯明殿，為同區關帝殿（虎尾寮的關帝廳）的六個角頭廟之二，其中山西武聖宮更是自關帝殿分靈而來。顯示在台南市東區的關帝信仰已發展成熟，且範圍頗大，故需要增設角頭廟來滿足信徒的要求。另一南天府，與顯明殿的關係也相當密切。第三、據筆者實際走訪調查的結果，發現其中的武玄宮雖然登記的主祀神為文衡聖帝，但負責人說其實際的主祀神是玄天上帝，所以在往後章節的討論中，筆者並未將此座寺廟列入。

另外，戰後政府開始要求各寺廟需要登記後，原本並無教別之分的民間宗教現在卻必須登記於各教別如佛教或道教、儒教之下。台南市大多數的關帝廟都登記為道教，但其中有兩座寺廟如此登記是不得不的做法。這兩座寺廟分別是建於民國五十八年（1969）的關帝聖堂及民國六十五年（1976）的文武聖廟，它們一為一貫道寶光組所建的公共佛堂，另一為正義輔導會所建立的寺廟。寶光組出自上海的寶光壇，民國三十四年（1945）由陳文祥先抵台北市開荒，其後開始向中、南部及東部拓展，後來分為多支支線，關帝聖堂即為玉山道場領導人王壽所建。<sup>99</sup>正義輔導會的道場是民國三十五年（1946）自上海傳入，首先在基隆及高雄市設立道場成立此一支線。隔年，又有陳自強（青島人）由上海來台南市開荒，而文武聖廟即陳自強設於台南市的總堂。<sup>100</sup>戰後，一貫道開始從大陸進入台灣傳道，但在民國五十二年（1963）遭到政府全面的查緝、取締，直到民國七十六年

<sup>98</sup> 范勝雄，《府城的寺廟信仰》（台南：台南市政府，1995年），頁226~227。

<sup>99</sup> 慕禹著，《一貫道概要》（台南：龍巨書局，2002年），頁96~102。

<sup>100</sup> 慕禹著，《一貫道概要》（台南：龍巨書局，2002年），頁126~127。

(1987) 政府才給予其合法的宗教地位。在這一段被查禁的時間中，同時也是一貫道發展最快的階段。<sup>101</sup>這兩座廟宇的建立，使得台南市的關帝信仰參雜一貫道的成分。

從民國四十年代、民國六十年代到民國八十年代的這些官方的實地調查統計資料及數據，大致可以看出戰後台南市的關帝信仰發展的幾個階段特色：一、民國三十四年光復後到民國四十年間，是傳統關帝廟的恢復期。因前期所建的關帝廟多受戰爭波及毀壞、傾頹，故信徒多於此時重建或重修，所以此段時間並無新建的關帝廟。二、民國四十年後到民國六十年間，則是關帝廟快速發展的階段。許多新建廟宇在不同地區紛紛出現，尤其是新開發的海埔新生地區，如南區、安南區等。且這些廟宇多屬具有教化意味、勸喻性質的鸞堂，顯示這一時間台南市的關恩主鸞堂崇拜正在奠定發展基礎。三、民國六十年後至民國八十年間，是發展穩定期。新開發的人口集中區仍是新增關帝廟宇的主要分布區，但早期建立的關帝廟香火仍然鼎盛，甚至透過種種活動的辦理來提升寺廟的聲望與香火，其中最積極者當屬原稱關帝廳的台南關帝殿。此階段有兩座新建的關帝廟：山西武聖宮及前甲顯明殿正為其角頭廟，顯示關帝殿開始成為東區關帝信仰的主要重心。

總結來說，台南市關帝信仰的發展過程可分為二個階段來看：前一階段鄭清時期，是關帝信仰開始進入台灣並奠基發展的階段。此時仍屬傳統的封建社會，朝廷的統治多帶有濃厚的神道設教意味。關聖帝君因有利於國家教化並能顯聖護國，故被列為國家祀典。在官方積極努力的建置下，加上清廷官兵私建關帝廟作為奉祀之所，到乾隆朝為止，全台南府城各地幾乎都有關帝廟的設置，且其分佈位置均在府城之內接近官署所在。而官方對這些官置寺廟的維護是相當的用心，多由行政首長負責修建。但自嘉慶朝以後，官方對臺地的控制日漸放鬆，使得民間信仰的發展得以更自由。加上府城的商業機能日趨強盛，故道光年間開始出現由民間私建的關帝廟，且即位於港區的繁榮之地。反映出關聖帝君的神職已有開始轉變的趨勢，而民間的奉祀也成為信仰持續發展的主要力量。第二個階段日治

---

<sup>101</sup> 邱麗娟編纂，《續修臺南市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台南：台南市政府，1996年），頁62~63。



及戰後時期，此階段與前期最大的差異在於，臺灣已開始進入現代社會的發展，政治力對全臺的控制相當深入。此一政治環境的改變，使關帝信仰的發展明顯和前一階段不同。其最大特徵是：清廷官方和士兵的撤離台灣，讓關聖帝君的官方色彩轉淡，從政教神的神格脫離出來，逐漸轉成專門滿足一般民眾需求的新的職能如商業神、甚至是強調恢復固有道德的鸞堂關恩主和一貫道屬性的法律主等。透過這些的新面向，關帝信仰得以自傳統中又增添其持續發展的新動力。另外，因政治力的控制深入，使得關帝信仰發展深受官方政策的影響。日治時期的「寺廟整理」及「市區改正」，明顯的讓關帝廟的發展受到打擊，整個信仰發展因此趨於有些停滯。戰後，對寺廟政策的逐漸開放，並致力於推動經濟發展，讓關帝廟的成長頗為迅速，也使得今日的關帝信仰仍大有發揮的空間。

隨時代變遷及都市計畫的進行，關帝信仰的發展也和台南市區的開發過程呈現相一致的態勢。台南市傳統的關帝信仰重心為昔日政、教中心所在的中區，最早的、最重要的關帝廟如開基武廟、祀典武廟都位於此區。當市區的發展隨商業繁榮擴增到西岸港區時，民眾奉為地方守護神的關帝廟也跟著建立，金華府即為明顯實例。迨現代都市計畫開始進行，人口逐漸向新開發區集中後，關帝信仰也隨後為居民所祭祀。如東區，戰後新建的關帝廟大都集中於此，使得原本居邊陲地位的關帝殿（虎尾寮關帝廳），透過相關人士大力的經營，逐漸成為此區的關帝信仰重心。南區，則屬於鸞堂的主要分布地。

圖 3-4 台南市關帝廟的分布圖

